

姚從吾先生對中國史上漢化問題的研究

盧胡彬

壹、序論

貳、姚氏研究中國史上漢化問題的重心

參、其著述目錄

肆、匈奴的漢化

伍、契丹的漢化

陸、西夏的漢化

柒、女真的漢化

捌、蒙古的漢化

玖、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拾、結論

壹、序論

姚從吾，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代史學大家，原名士鰲，字占卿，一字存吾，常以「從吾所好」自勉，後乃改名從吾，晚年又自署善因，河南省襄城縣人。父筱萬公（名福同），母黃氏，生於清光緒二十年九月初九日（西元一八九四年十月七日）。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四月十五日晨，依往例往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第二研究室工作，十二時二十分，學生叩門入室，發現先生坐座椅中，已不省人事，乃急送台大醫院，終因心臟衰竭，遂告不起，享年七十有六。

（註1）

先生治學，主張「以勤補拙」，常期勉後學：「學游泳要跳到水裡去」，「騎馬要坐到馬背上」、「畫我須是我」。（註 2）其於任教台大的二十一年中，著述最勤快，最豐富，貢獻亦至巨。（註 3）先生早年留學德國，據云未獲文憑，卻深受德國學術界鑽研北亞游牧民族歷史之影響，著作以遼金元史為主，（註 4）其於所著中，表現一個十分重要的中心課題，即邊疆民族進入中原以後，和中原漢族間的關係，包括邊疆文化和中原儒家大同文化之交流。（註 5）或基於仰慕，更為求表彰，本文將綜述先生對於中國史上漢化問題的研究。

貳、姚氏研究中國史上漢化問題的重心

姚從吾先生認為「歷史是民族力量與民族智慧在時間活動中相加（互相配合）的成果」，（註 6）「歷史是檢討得失的科學」。（註 7）而中華民族歷史與文化的形成「由於五大醞釀，四大混合」。（註 8）職是之故，其於研究中國史上的漢化問題時，所注意者，有下列數點：

一、略合文化人類學涵化概念，自謂所強調之漢化絕非同化。

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二月十八日，先生參加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四〇次座談會，發表〈契丹漢化的分析〉，曾自標附題：〈從契丹漢化看中國史上東北草原文化與中原農業文化的合流〉，並於引言中一再強調：

本篇所說的漢化，也與近年來中等學校教科書中所說的漢化，不盡相同。這裏所說「契丹的漢化」，是依據《遼史》及其他可信的史料，說明生長我國東北草原社會中的契丹族，在第十第十一世紀與中原漢族文化接觸後曾經發生過什麼影響，有些甚麼樣的結果。這些影響是兩方面的，相互的，沒有偏狹誇大的意思。我們應當知道，契丹族與漢族接觸的時候，是漢族最倒楣的時候。當時（一九〇七）大唐衰亡，中原三方爭霸。朱溫篡了唐祚，占領河南，建立梁朝。沙陀李克用割據太原，自稱後唐。河北劉仁恭劉守光父子占領幽州，自稱燕王。契丹族耶律阿保機、耶律德光父子則乘時崛興於遼河上游，開始進兵南侵，參加中原的戰爭。到了西元九三八年正式獲得燕雲十六州以後，契丹族成為華北漢人的統治者。他們的原意，祇是想指揮漢官，利用漢人，墾荒生利，為他所利用而已；並沒有接受漢化的意思。因此當時有「番不治漢，漢不治番，漢番不並治」的說法。《遼史》中也常以「國制」與「漢制」對稱。這與元朝初期稱蒙古為「草地」，稱中原為「漢地」一樣，都是對待的。後來契丹族因客觀需要的逐漸增加，對於中原漢地文化，（制度、倫常、習慣等）方逐漸分別採行。這種採行，不但是主動的而且是有選擇的。漢文化在當時對契丹人不但沒有威脅，而是任聽契丹自取。你若有意追隨，我就誠心看待，真和慈母對於子女一樣。所以德國的華學家衛禮賢(Dr. R. Wilhelm)先生說：中國的文化是「母性的文化」(Weibliche Kultur)，就是這個道理。（註9）

緣此胸懷，先生直指研究歷史應該「以唐還唐，以漢還漢」，研究北亞遊牧民族的歷史，不應只從農業漢民族的觀點來看，應從他們自己的觀點與史料來重新估計。（註10）

二、可把長城當作番漢文化的分界

我國北方長城內外，存在著顯然不同的兩個社會和兩種文化。長城以外是遊牧民族的草原社會，漁獵文化。長城以內是中原農耕民族的城村社會，農業文化。這種說法，先生認為啓始於《史記》（卷一一〇）《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中〉所記：「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註11）並引證：「從前歐洲學者常把長城以內的中國，比做一個大鹽海，所有流入這個鹽海內的文化、人種，過了一個時期，即都變成中國的了」。（註12）說明長城實為華夷融會的門戶。（註13）

三、中華文化的主流與支流

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八月二十三日，先生應聯合國同志會之邀請，發表專題講演，講題是〈對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其所提精闢見解之一為：

因此我認為中華文化也實以秦漢、隋唐兩大時代的漢族中原儒教大同文化為主流。東北黑水白山區域亦漁、亦獵、亦農的「女真滿洲文化」為第一支流。北方大漠草原區域的匈奴、突厥、回紇、契丹、蒙古諸「遊獵民族的畜牧文化」為第二支流。介於兩支流之間的東胡，後稱烏桓、鮮卑（諸燕、拓跋魏、宇文周、高齊）等，也曾發揮過調和互助的作用。大體上說，拓跋魏等可歸入第一支流，而契丹與奚則與第二支流接近。西部與西南高原區域的吐蕃、南詔、西夏等「羌藏山岳文化」為第三支流。介於北方與西部的西北區域，天山南北路；北路大體上可歸入北部的遊牧族；南路的「綠洲文化」可歸入西南的第三支流。就吾國歷史演變的大勢說，長城以內的黃淮平原，渭水谷地的中原農業文化是主幹，所以漢、唐兩大黃金時代，都先後產生於此一區域。黑水白山的第一支流，雖開發較晚，而金朝與清對於漢、唐儒教大同主義文化的發揚廣大，功績實不可沒。第二草原文化區，疆土遼闊，波動亦大。匈奴、突厥、回紇、契丹、蒙古等，歷代均為中原文化爭霸對抗的對手。比較能和好相處者，則是西與西南方的羌藏民族。中原主流農業社會的儒教大同文化為母體，第一、第二、第三支流的其他文化為輔佐。（註14）

四、遼金元三朝史在國史中的地位與重要性

統觀先生之著作主要在遼金元史的範圍之內，故其於教授遼金元史總導論時，曾綱要此三朝史在國史中的地位與重要性為：

1. 中古以後，邊疆民族自動歸化中原文化的開始。
2. 受考驗而得到成功。
3. 新血輪的流入，文化內容的擴大。
4. 儒家大同文化的適應性與擴大化。
5. 兼容並包性的擴大，世界性的長成。
6. 第五大混合後的展望。（註15）

五、對「中原儒家大同文化」的推崇

依先生之見，中原儒家文化，簡單說就是合理的中庸主義。即是長於適應環境，不作極端的違反人性的主張。富於擇善而從，不重泥古不化。因此牠能隨時演進，隨時吸收邊疆民族，感動他們，而使他們歸向中原，以增加母體的繁榮。又因歷史悠久，地大人眾，每遇外族競爭時，憑藉雄厚，可以持久不竭。同時又賴有自孔子、孟子傳流下來的一套人生哲學，富於人情意味，比較持中客觀，所以容易與他族共存共榮。漢文化在外族入侵時期，能得保全，這是最大原因之一。其次是守法不阿與誠實不欺。這一類最佳的表現，是「臨財毋苟得，與臨難毋苟免」。這是中原文化在外族入侵時期，能得保全的原因之二。再次是中原文化的易知易行。己所不欲，毋施於人；己之所好，推己及人。這些也應當是中華歷史悠久，文化昌盛和與時俱進的主要因素。（註16）

六、未曾採用美日學者喜用之「征服王朝」一名詞及觀念

先生一再強調：

中原儒教大同文化，就已往的歷史看起來，牠本身沒有一次曾被圍繞牠的邊疆民族所破壞或征服。國史上所顯示中原儒教大同文化與邊疆民族的關係，雖說起自北方與東北方邊疆民族的入侵，但實在說祇有華夷雙方短期的對峙，或邊族進入長城以後，逐漸自動的歸化，即變成儒教大同文化的奉行著。（註17）

堅持此一看法，其嚴厲批判：

艾伯哈德(W.Ebernard)先生把已漢化的邊疆民族，乘中央政府勢弱而又叛變的劉淵輩，當作外族征服者，則又真如瞎子摸象，自誤誤人了。須知久居長城以內的邊疆民族，遇機奪得政權，那已成爲儒教文化範圍內的家務問題，是不應作爲對等外國看待的。（註18）

通貫先生學說，其未採用「征服王朝」的理由，是先生主張中華民族歷史的發展是雙軌的，長城以內是一個歷史系統，長城以外是一個歷史系統，兩個歷史系統的衝突，純粹是文化背景的差異所形成，所謂滿漢問題，所謂蒙漢問題等，純粹是中國內部的問題，怎能談得上誰征服誰？（註19）

參、其著述目錄

爲表行文有據，並示本文章節安排之由來，茲彙編先生有關中國史上漢化問題研究諸論著成目，且略予分析。

表一：姚從吾先生對於中國史上漢化問題研究著述目錄：

1. 蒙古史發凡

(1) 柯勞斯教授著、姚從吾譯並注。

(2) 《輔仁學誌》，一卷二期（民國十八年九月）。

(3) 收入《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遼金元史論文（下）》

2. 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

(1) 《國學季刊》，二卷三期（民國十九年九月）。

(2) 民國四十三年改訂，更名為〈近代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收入《東北史論叢》（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四十八年九月）上冊。

3. 匈奴史研究

民國十九年至二十五年，三冊。

4. 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

(1) 《國學季刊》，五卷一期（民國二十四年三月）。

(2) 《東北史論叢》上冊。

(3) 民國五十一年增訂，刊入《第二屆亞洲歷史學家會議論文集》中。

5. 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

(1) 《治史雜誌》，第二期（民國二十八年六月）。

(2) 《東北史論叢》下冊。

6. 契丹君位繼承問題的分析

(1) 《文史哲學報》，第二期（民國四十年二月）。

(2) 轉載《宋史研究集》第三集。

- (3) 《東北史論叢》上冊。

7. 契丹漢化的分析

- (1) 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四〇次座談會紀要，民國四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 (2) 《大陸雜誌》，四卷四期（民國四十一年二月）。
- (3) 《東北史論叢》下冊。
- (4) 韓復智編：《中國通史論文選輯》（台北，東昇出版業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一年十月）下冊。

8. 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

- (1) 《文史哲學報》，第四期（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
- (2) 《東北史論叢》下冊。

9. 女真漢化的分析

- (1) 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六十三次座談會紀要（民國四十二年二月）。
- (2) 《大陸雜誌》，六卷三期（民國四十二年二月）。
- (3) 《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遼金元史論文（上）》（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七十年七月）。

10. 成吉思汗的智囊團

- (1) 《中國一周》，一五九期（民國四十二年五月）。
- (2) 《東北史論叢》下冊。

11. 金朝上京時期的女真文化與遷燕後的轉變

- (1) 《邊疆史文化論集》（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民國四十二年）上冊。
- (2) 《東北史論叢》下冊。

12. 契丹人的「捺鉢生活」與若干特殊習俗

- (1) 《邊疆史文化論集》上冊。
- (2) 改訂爲〈說契丹的捺鉢文化〉，收入《東北史論叢》下冊。

13. 阿保機與後唐使臣姚坤會見談話集錄

(1) 《文史哲學報》，第五期（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

(2) 《東北史論叢》上冊。

14. 十三世紀蒙古人的軍事組織遊獵生活倫常觀念與宗教信仰

(1) 《邊疆史文化論集》中冊。

(2) 改訂為〈成吉思汗窩闊台汗時代蒙古人的軍事組織與遊獵文化〉，收入《東北史論叢》下冊。

15. 遼金元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地理遼金元篇（民國四十三年七月）。

16. 說遼朝契丹人的世選制度

(1) 《文史哲學報》，第六期（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

(2) 《東北史論叢》上冊。

17. 富弼

(1) 《中國一周》，二六〇期（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2) 《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遼金元史論文（上）》。

18.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1) 《大陸雜誌》，十一卷一期（民國四十四年五月）。

(2) 大陸雜誌社編印：《元明史研究論集》（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輯第六冊）。

(3) 《東北史論叢》下冊。

19. 六盤山賀賁獻金

(1) 《中國一周》，二八〇期（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五日）。

(2) 《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遼金元史論文（下）》。

20. 遼金元時代的長城

(1) 《國立台灣大學十週年校慶專刊》（民國四十五年三月）。

(2) 《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遼金元史論文（上）》。

21. 元邱處機年譜

- (1) 《中國學術史論集》（民國四十六年）。
- (2) 《東北史論叢》下冊。

22. 匈漢爭奪東亞霸權的檢討

- (1) 《學術季刊》，四卷四期（民國四十五年六月）。
- (2) 改訂為〈匈奴與西漢爭奪東亞霸權的檢討〉，收入《東北史論叢》上冊。

23. 黑韃事略中所說窩闊台汗時代胡丞相事蹟考

- (1)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廿八本下冊，《慶祝胡適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民國四十六年五月）。
- (2) 《東北史論叢》下冊。

24.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 (1) 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一七二次座談會紀要，民國四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 (2) 《大陸雜誌》，十五卷六期（民國四十六年九月）。
- (3) 收入《東北史論叢》上冊，代序。
- (4) 查時傑編：《中國通史集論》（台北，常春樹書坊，民國六十二年九月）

25. 遼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詞冤獄的文化的分析

- (1) 《文史哲學報》，第八期（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
- (2) 《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遼金元史論文（上）》。

26. 《東北史論叢》上冊收錄：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代序）

近代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

匈奴與西漢爭奪東亞霸權的檢討

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

阿保機與後唐使臣姚坤會見談話集錄

契丹君位繼承的分析

說契丹人的世選制度

《東北史論叢》下冊收錄：

說契丹的捺鉢文化

金朝上京時期的女真文化與遷燕後的轉變

遼金元疆域沿革與地理因素對當時政治文化的關係

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

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

成吉思汗的智囊團

元邱處機年譜

成吉思汗窩闊台汗時代蒙古人的軍事組織與遊獵文化

黑韃事略中所說窩闊台汗時代胡丞相事蹟考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27. 我國歷史綿延擴大原因的舉例

《青年學術年會論文集》（民國五十一年五月）。

28. 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校注

(1) 《大陸雜誌特刊》第二輯（民國五十一年五月）。

(2) 大陸雜誌社編印：《遼金元史研究論集》（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二輯第三冊）。

(3) 《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遼金元史論文（下）》。

29. 張德輝「嶺北紀行」足本校注

(1) 《文史哲學報》，第十一期（民國五十一年九月）。

(2) 《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遼金元史論文（下）》。

30. 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

(1) 《大陸雜誌》，二十六卷三期（民國五十二年二月）。

(2) 大陸雜誌社編印：《遼金元史研究論集》

(3) 《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遼金元史論文（中）》（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七十一年四月）。

31. 從宋人所記燕雲十六州淪入契丹後的實況看遼宋關係

(1) 《大陸雜誌》，二十八卷十期（民國五十三年五月）。

(2) 大陸雜誌社編印：《遼金元史研究論集》

(3) 《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遼金元史論文（上）》

32. 說蒙古秘史中的推選可汗與選立太子

(1) 《文史哲學報》，第十三期（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

(2) 《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遼金元史論文（上）》。

33. 元初封龍山三老之一李治與關於他的若干問題

(1) 《陳百年先生執教五十周年暨八秩大壽紀念論文集》（民國五十四年教師節）。

(2) 《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遼金元史論文（下）》。

34. 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與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

(1) 《文史哲學報》，第十五期（民國五十五年八月）。

(2) 《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遼金元史論文（中）》。

35. 遼金元時期通事考

(1) 《文史哲學報》，第十六期（民國五十六年十月）。

(2) 《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遼金元史論文（上）》。

36. 忽必烈汗與蒙哥汗治理漢地的歧見

(1) 《文史哲學報》，第十六期（民國五十六年十月）。

(2) 《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遼金元史論文（中）》。

37. 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

(1) 原名：《談談元世祖忽必烈可汗》，曾於民國五十四年秋季在邊疆歷史語文學會第四十一次「蒙古講演會」中宣讀。

- (2) 改題載入中國邊疆語文學會印行：《蒙古研究》（民國五十七年二月）。
 - (3) 《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遼金元史論文（中）》。
 - (4) 韓復智編：《中國通史論文選輯》下冊。
38. 遼朝契丹族的捺鉢文化與軍事組織世選習慣，兩元政治及遊牧社會中的禮俗生活《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一集（民國五十七年六月）。
39. 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問題《文史哲學報》，第十七期（民國五十七年六月）。
40. 鄭思肖與「鐵函心史」關係的推測
- (1)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特刊慶祝蔣慰堂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
 - (2) 《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遼金元史論文（下）》。
41.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
- (1) 《孔孟學報》，第十六期（民國五十七年九月）。
 - (2) 《史學彙刊》，第二期（民國五十八年八月）。
 - (3) 《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遼金元史論文（中）》。
42.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前後的南人問題
- 《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一期（民國五十八年三月）。
43. 金元之際孔元措與「衍聖公職位」在蒙古新朝的繼續
-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九本，《慶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民國五十八年十月）。
44. 從歷史上看東亞儒家大同文化的立國精神
- (1) 《東方雜誌》，新三卷五期（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
 - (2) 又載教育部文化局編印：《中華文化之特質》內。
45. 元好問癸巳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
- (1) 遺稿（本稿應非先生最後的定稿）。
 - (2) 《文史哲學報》，第十九期（民國五十九年六月）。
 - (3) 《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遼金元史論文（中）》。

46. 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問題

(1) 《邊政研究所年報》，第一期（民國五十九年七月）。

(2) 《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遼金元史論文（下）》。

47. 女真建國與漢化

方豪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二冊，《歷史學》（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年十二月），頁五七～五八。

金元全真教

全前，頁七八～七九。

金世宗之文治

全前，頁七九。

忽必烈以後的元朝（一二九四～一三六八）

全前，頁八〇～八一。

契丹漢化

全前，頁八五～八六。

耶律楚材與元太宗

全前，頁八六～八七。

48. 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遼金元史講義——甲、遼朝史》（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一年四月）。

49. 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姚從吾先生全集（三）——遼金元史講義——乙、金朝史》（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二年九月）。

50. 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姚從吾先生全集（四）——遼金元史講義——丙、遼朝史》（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三年九月）。

51. 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遼金元史論文（上）》收錄：

遼金元時代的長城

遼金元時期通事考

契丹漢化的分析

遼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詞冤獄的文化的分析

從宋人所記燕雲十六州淪入契丹後的實況看遼宋關係

富弼

女真漢化的分析

52. 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遼金元史論文（中）》收錄：

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與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

元好問癸巳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

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

忽必烈汗與蒙哥汗治理漢地的歧見

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

53. 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遼金元史論文（下）》收錄：

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問題

元初封龍山三老之一李治與關於他的若干問題

六盤山賀貢獻金

鄭思肖與「鐵函心史」關係的推測

鐵函心史中的南人與北人問題

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校注

張德輝「嶺北紀行」足本校注

蒙古史發凡

所錄凡五十三目，計有專書四冊，論文四十三篇，論文集五種六冊，辭條六條。其應留意者：

（一）別人的命題都很短，而先生所擬就的題目特別長，此作文命題的特色，主要的是先生欲讓閱讀者見到題目即知文章的內涵、人物、時代。（註20）

（二）研究方式可分史料校註、前人研究成果介紹、翻譯、人物傳記、歷史地理、宗教及一般性論述。因先生之史學，來自史學大師尼博克和樂克，此派重視批評史料，選擇史料。（註21）故比例上，史料考據為獨重。

（三）先生認為現代的學界就像商場一樣，對行情的了解是絕對需要的，閉門造車式的治學是一件極度危險的事。（註22）故非常注意國外學術界的研究現況和水準。

（四）遼金元史是重心。然先生對於建立遼朝的契丹以及建立金朝的女真，已有統觀概念，故各有一專文（並各有一辭條），分析其漢化。至於建立元朝的蒙古民族，則分別由蒙古人（統治者）與漢人南人（被統治者）著手研究，只見分析，未有綜合。

肆、匈奴的漢化

「匈奴」在西元前二世紀已在東亞北部建立大國，與中國對峙爭長。所據地域，強盛的時候，包括現在的內外蒙古、東西土耳其斯坦、滿洲、山西、直隸及俄國的一部。（註23）匈奴史的研究，因為冒頓單于行爲的奇特，張騫、蘇武故事的動人，在歐、美東亞史與東方學，特別是漢學的探討中，始終佔據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史記》、《漢書》的〈匈奴傳〉、《魏書》的〈西域傳〉一再被西方的漢學家譯成近代文字，匈奴人的來源與去蹤如何？他們是否即是民族大遷徙時期的匈人？兩漢帝國與羅馬帝國有無關係？中央亞細亞已往歷史如何？這些問題，因為漢文古代史材料的豐富，匈人問題影響的遠大，中亞區域的遼闊，至今猶為西方漢學，東方學家所樂於商討與追尋。（註24）先生關於匈奴部分之研究，除曾將西方若干東方歷史家與漢學家研究匈奴史的結果加以介紹外，曾討論過：〈匈奴的立國精神〉、〈匈漢爭奪東亞霸權評議〉、〈西漢和親政策的新評價〉、〈匈奴文化的特點〉、〈匈奴西遷的研究〉、〈陳湯與郅支單

于》等，（註25）並結集爲《匈奴史研究》（北大講義）。其中與漢化問題研究有關者，僅爲：

（一）我國中古史中，以長城爲番漢文化分界的象徵，起於西漢初年。這一解說，直到遼朝與元朝，一般人的看法猶未改變。（註26）

（二）匈奴屬於中華文化的第二支流。（詳本文貳之三）。

（三）贊同傅朗克著：《中華通史》一書中所云：「兩漢是孔教大同主義正式成立時期，中原漢族戰勝了匈奴，向西發展，形成了孔教大同主義的新世界」（註27）及「秦朝與西漢是儒教被認爲國教時期，也即是儒教大同主義文化的正式形成時期」。（註28）且略加修正，成爲：「秦與西漢的統一與強大的發展，是儒教大同文化的正式形成時期，也是奠定基礎時期。因此我們主張兩漢是我們的第一個羅馬帝國」，（註29）「是儒教大同主義文化的黃金時代」。（註30）兩漢時代，中原儒教文化的向外發展，可以說是兩漢因得發揮雄厚的財力與充沛的人力，擁有強大的武力，而使四鄰來朝，異族歸服。（註31）因此我們認爲此時之儒家文化，其價值是主觀的。（註32）這種文化到底有沒有可崇信可仿效的價值，我們尚不能確定。（註33）

（四）引介德國學者夏特 (Friedrich Hirth. 1845 - 1920) 在《窩耳迦河的匈人與匈奴》(Veber Wolga-Hunnen undhiungnu.) 一書中的意見，確指匈奴的一再分裂，都和接近中國，傾向漢化有若干的關係（此亦即爲北匈奴二次西遷的主要原因）。（註34）

伍、契丹的漢化

依《遼史》所記，契丹在第十、第十一世紀的生活方式是漁獵的、遊牧的。即是打獵與打魚並行，歲時田牧平莽間，轉徙隨時，車馬爲家的草原文化。中原漢族的生活方式是耕織的，農業的。即是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的農業文化。這兩種文化在遼朝（九〇一～一一二五）長期存在。因爲遼國境內存在著兩種生活不同的人民，兩種不同的文化，所以「契丹漢化」，「番漢分治」，「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互相影響」，或「彼此合流等等問題，才隨之而生。（註35）

一、契丹捺鉢文化略述（註36）

契丹是我國東胡的一支，雖是遊牧民族，但因所居地域西遼河，平地松林一帶，水源不竭，森林密茂。建國（九一六）以後，疆土日大，因地制宜，漁獵並重，形成了一種營衛式的四時捺鉢制度。

《遼史》（三十二）〈營衛志〉中說：「遼國盡有大漠，因宜爲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爲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有事則以攻戰爲務，閑暇則以畋漁爲生，無日不營，無在不衛；立國規模，莫重於此」。宋人龐元英《文昌雜錄》說：「北人（契丹人）謂『住坐處曰捺鉢』。聞契丹主四時皆有捺鉢，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聘，問之，答曰：『是契丹語，猶言行在也』」。由是知「捺鉢文化」就是「以四時行在所爲主的漁獵文化」。

《遼史》（三十二）〈營衛志〉「行營篇」，曾有專條，記載契丹可汗的四時捺鉢生活：

(1)春捺鉢，一曰春水，多在長春州的鴨子河濼。每年正月上旬由冬捺鉢來，先卓（立）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方縱鷹捕鵝雁。弋獵網鉤，春盡乃去。

(2)夏捺鉢，無常所。主要地域，不在永安山的涼陁，即在鴛鴦濼（今張北縣）的炭山。重要活動是障鷹、避暑與南北臣僚會議國政。時間：自五月末旬到七月中旬。

(3)秋捺鉢，一曰秋山。主要地域是慶州的伏虎林，重要活動是射鹿及捕虎。七月中旬至九月末去。」

(4)冬捺鉢，地址比較固定，多在永州的廣平淀。冬月稍暖，牙帳多坐冬於此，與南北大臣會議國是，兼受宋、夏諸禮貢。

由上述四時捺鉢的習慣，可知契丹舊有政治的組織與施政重心，都以四時行在所爲主幹。故《遼史》〈營衛志〉又說：「皇帝四時巡狩，契丹大小內外臣僚及漢人宣徽院所轄百司皆從」。另上述自春至冬是契丹人一年中漁獵生活的歷程，也就是契丹漁獵本位文化的精神，這是與長城以內漢地人民的生活大不相同的。

二、契丹對於漢化的反應及其分期

契丹對於漢化態度的決定，就當時各方面的情勢而言，完全是主動的，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契丹自西元九〇七年利用逃難漢人開墾遼河上游之後，到九三八年燕雲十六州的正式割讓，為期約三十年。這三十年間，漢人聽從契丹指揮驅使的當然是一些流亡分子和戰爭俘虜。數目雖多，管理上應無困難。燕雲十六州割讓以後，情勢就不同了。十六州內的人數、地域、農業、商業、工業，比諸契丹本部，均占優勢。這些新得地區中的人民，自然有不少才智優秀、勇健有為之士。當時就客觀的情勢說，天下久亂，人必思治。一般人對於統治者的期望，止戈保民，不事苛擾第一。休養太平，生活安定第二。契丹人是豪爽有度量的民族。阿保機、耶律德光的豁達大度，擇善而從，更是值得欽敬。當時他們對新得地域，採行互相提攜的兩元政策，（以國制治契丹，以漢法治漢人）實為卓識遠見。這樣即奠定了兩民族合作的基礎。唐末河北地區本已沾染胡化，契丹與漢人又素無世仇深恨，因是種種，也獲得了預期的結果。自九三八年到一〇〇四年遼宋締結澶淵友好盟約，為時六十餘年，可以說是遼漢互相了解時期。澶淵盟約以後，宋朝歲幣按年北來，二十萬疋絲絹，十萬兩銀子，更滋潤了契丹帝國的繁榮，也更增進了遼漢兩族友好的關係。自一〇〇四年直到一一二五年，遼朝滅亡，可以說是遼漢（包括北宋在內）共存共榮時期。契丹對漢化的反應，因時而制，而演進的方向則是逐步好轉。（註37）茲為便覽計，轉錄先生所創簡表如下：

表二：契丹對於漢化反應的幾個時期

時期	紀年與大事記	態度	重要行動 (文化演變的動態)
第一階段 ——克難自強時期	神冊以前（西元九〇一～九〇七～九一六）。自阿保機為迭刺部大人到被推為八部大人。	自力更生。（努力克服困難）。	一、契丹與漢文化初次接觸，遭遇劉仁恭燒荒困難。 二、阿保機努力向西發展，克服劉仁恭加諸契丹的困難，並伸張勢力於長城以內。 三、聯結李克用（太原），遠交近攻，實行南侵政策。
第二階段 ——墾荒南侵時期	自神冊建號到燕雲十六州的獲得（九一六～九三八）。西元九〇七～九二六年阿保機死，翌年耶律德光繼立。	全盤接受漢化。	一、收容逃難漢人，遷徙關內俘虜，利用韓延徽等教導開墾、種植、婚配、授業，使漢人安居。 二、有計畫的建築漢城，創立村鎮，發展農業。 三、大舉援晉，戰勝後唐，正式獲得燕雲的割讓。
第三階段 ——漢番兼容時期	自會同到澶淵盟約（西元九三八～一〇〇四）。九四七年耶律德光建立大遼實行番漢分治。	有限度的接受漢化，與兼容並包。	一、設置南面、北面官分治契丹、漢地事務。 二、實行考試進士。但嚴禁契丹人參加。

第四階段 ——擇善而 從時期（遼 漢文化合流 時期。）	自澶淵盟約到宋人 謀復燕雲。（西元 一一〇四～一一二 五）。	放任自便 （聽從自然 選擇）。	一、考試制度日趨發達，最後 契丹人也見獵心喜，自動參 加。 二、契丹立君制度的逐漸轉 變。嫡長世及制的確立。 三、遼漢文化逐漸合流。統治 權瓦解後，契丹人逐漸變成廣 義的漢人。
---	---	-----------------------	---

資料來源：姚從吾：〈契丹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遼金元史論文（上）》，頁四八～四九）

三、重大紀事

1. 遼朝與長城

長城在遼朝（九〇七～一一二五）特別被提起的，約有兩次。一是把長城當作契丹文化與中原文化區分的界線。二是唐末劉仁恭曾焚燒長城外沿塞荒草（即所謂「燒草政策」），促成契丹欽德（痕德堇）可汗政權的崩潰；而予阿保機一個建立遼朝的機會。（註38）

2. 阿保機的尊用漢人與接受漢化

遼金元三朝創業諸帝，真能利用漢民族的智慧，闢地築城，採用漢族文化，建立國家的，首推遼太祖阿保機。（註39）

契丹是遊牧民族，習慣上軍事民政均寓於遊牧田獵式的日常生活之中，並無獨立的內政，也向來不重視文治。但是到了阿保機時代則另是一番氣象了。四時田獵以外也開始採行中原漢族的文化。從此有了內政，並且特別崇尚文治，這種表現尤其是在新得漢人區域與漢人契丹雜居的地方，更為明顯。尊崇孔教與建立孔廟，更是崇尚文治最有力的表示。（註40）

中原漢族雖尊孔子，但一般社會，也兼重釋教與道教。阿保機是主張採行中原漢化的，對於漢族尊信的宗教，自然也一視同仁。三教並重，從眾所欲，不過他處置的辦法，則甚別致。那就是阿保機以皇帝的身分祀孔。同時皇后「祀佛」，皇太子「祀道」。（註41）

阿保機利用韓延徽，（註42）康默記，（註43）韓知古，（註44）等收容漢人，開墾荒地，建立漢城，（註45）擴大國家的組織。並詔畫前代直臣像為招諫圖，創立契丹自用文字。（註46）他是一位中國通，但他有意不說漢話，（註47）而喜用通事。（註48）

總評之，其於文化經濟方面，阿保機是一個轄達大度，知人善任，擇善而從的創業家：

- (1)他能知己知彼，對於中原農業文化，取長棄短，種植五穀，煮鹽藝菜，以補充遊牧社會的不足；
- (2)他能利用北徙漢人，移民墾荒，開發熱河遼水上流，使內地的州縣制度（漢城）向北移植；
- (3)他能尊從儒、釋、道三教，使燕雲人士，上自士大夫，下至三教九流，各有所主，以促進番漢兩族的合作。（註49）

3. 從捺鉢文化到番漢分治

契丹勢力南移，管理的漢地日廣，漢人日多，契丹的事務，隨著行營可由皇帝裁決。但眾多的漢人事務，怎樣處理？於是乃有番漢逐漸分治的制度，應時而生。《遼史》（三十二）〈營衛志〉中說：

每歲正月上旬，車駕啓行，宰相以下，還於中京，行遣漢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臨時署理），俟會議行在所（夏冬捺鉢）取旨，出給誥敕，文官縣令、錄事以下更不奏聞，聽中書詮選；武官須奏聞。

這些自然是遼朝初年的情形。後來才進步到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治漢人的兩元制度。《遼史》（四十五）〈百官志〉：「契丹舊俗，事簡職專，官制樸實」。

「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北南，以國治制契丹，以漢制治漢人」。「北面（官）治

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官）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這些都可以看到番漢分治習慣的演變。（註50）

4. 契丹對於漢化長期考驗後的擇善而從

澶淵盟約（一〇〇四）以後，南北相安，契丹人統治燕雲，已六十餘年，至是方大量採行漢地制度，因以達成番漢融洽的合作。

(1) 燕雲十六州歸入契丹，不是由戰爭獲得，而是由石晉贈送，以故契丹上至可汗，下至平民，對他們都優禮有加。尊重投靠的降臣，使他們充任燕雲地方行政首長，使民心不疑。（註51）

(2) 優禮世家大族，所謂韓、趙、劉、馬四大名族，備受尊敬，以安定新歸附的人心。蘇轍（一〇三八～一一一二）《欒城集》（四十一）：「北朝之政，寬契丹，虐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問山前諸州祇侯公人，『止是小民鬥爭殺傷之獄，方有此弊。至於燕人強家富族，似不如此。』兼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註52）

(3) 宋田況（一〇〇三～一〇六一）《儒林公議》（二卷）中曾有九條說到燕雲十六州入遼後的情形。大意說：「聞南山後初隸虜，民不樂附，常苦苟息偷生」。「歲月既久，漸便習不怪」。「既澶淵盟好，歲給金繒，虜人欣然奉約。自是河朔之民，漸有生意」。（註53）

(4) 採行考試制度。契丹以戰鬥立國，文事武備，不易兼容，故初期對中原所行考試制度，不甚注意。到了聖宗統和七年（九八九），契丹兼統燕雲已五十餘年（九三八～九八九），漢地讀書人日多，實需要一套入仕辦法。朝廷乃於統和七年（九八九），在漢地開科取士。初期參加者以漢人為限，契丹人不准應考。後來覺得公開考試，甚為公平與方便，尺度也就放寬了。考試制度定期舉行，共有六十餘次。錄取人數，由兩人也逐漸增加至一百三十餘人。（註54）

(5) 立君習慣的改從漢制。契丹自有的是世選制度，並且沿襲已久，對於游牧社會卓有成效。（註55）九三八年以後兼統漢地。選汗習慣漸不適用。到了景宗與承天皇后時代，採韓德讓（耶律隆運）等的建議，決定預立太子，實行中央集權，將選汗習慣正式改為嫡長世及制。（註56）

5. 遼興宗的聽經迎母

興宗生母原爲聖宗元妃。時嫡母——齊天皇后，生子不育，養興宗如己出。元妃忌恨妒寵，讒毀百端，聖宗不之信。聖宗疾，遺命以齊天爲皇太后，法天（元妃）爲太妃，並囑興宗善事太后。帝崩（一〇三一），興宗立，法天寢遺命自立爲皇太后，臨朝稱制。因誣齊天與駙馬蕭匹敵謀逆，逼令自殺。興宗代懇，法天不從。攝政三年（一〇三一～一〇三四），賣官鬻爵，多殺功臣；殘毒番漢，朝野爲之側目。

興宗曾以上尊酒，銀帶，賜樂工。內侍高慶郎譖於法天，法天怒鞭樂工。興宗偵知，使左右刺殺慶郎。法天太后愈怒，下吏雜治，語連興宗，興宗鬱鬱不樂。重熙三年（一〇三四），興宗發精兵五百騎，立馬於行宮東之小山上，命耶律喜孫、趙安仁直入太后宮驅使登黃布車，幽於慶州。諸舅並廢。

興宗幽母後，改葬齊天太后，革除弊政，耳目一新。群臣數勸帝迎母，冀可多得宋幣，皆不從。興宗篤信浮屠法，習聞漢俗孝道。重熙八年（一〇三九），曾命僧建佛事，帝聽講報恩經，因大感悟，即遣趙安仁迎母歸朝。館於中京門外，遂爲母子如初。

遼興宗的聽經迎母，可證明契丹人已全部接受了漢文化的孝親觀念。（註57）

6. 遼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詞冤獄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小字觀音，欽哀皇后（聖宗后，興宗母）弟南院樞密使蕭惠之少女。幼能誦詩，旁及經子。及長，姿容端麗爲蕭氏諸女之冠。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觀音。工詩、喜書、善談論，能自製歌詞。喜彈箏，尤喜琵琶，爲當代第一。重熙二十一年（一〇五二），道宗以燕趙國王洪基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知惕隱事，預朝政，二十二年（一〇五三），王慕后賢淑，納爲妃，道宗亦喜詩歌，由是愛幸，遂傾後宮。道宗即位（一〇五五）改元清寧，十二月冊爲皇后，四年（一〇五八）皇子濬生，有專房寵。九年（一〇六四）皇太叔重元突襲灤河行帳，權臣耶律乙辛助平內亂，由是專權用事，與后族相水火。后又喜於上前稱引古今諫馳獵，諫時政得失，以故咸雍之末，遂稀幸御。后好音樂，

伶官趙惟一得侍左右。大康初（一〇七五）宮婢單登，教坊朱頂鶴誣后與惟一有私。耶律乙辛設謀證實之，聞於道宗。張孝傑復助乙辛爲虐，因族誅惟一，賜后自盡。昭懷太子因生母慘死與耶律乙辛勢不兩立，蕭十三、張孝傑等則助乙辛謀害太子，形成皇后、太子死後骨肉株連的慘狀。

總結上述，遼道宗時十香詞冤獄的發生，耶律乙辛諸人的殘暴，宣懿皇后、昭懷太子等的冤死，皆由於文化方面的陰錯陽差。就中如契丹宣懿皇后慕效唐代徐賢妃，因是向契丹可汗道宗進諫得失，上書諫獵，以致夫婦反目。又如皇后好音樂而讓伶官趙惟一入宮彈箏；又因作回心院詞而代寫淫俗的十香詞。又如耶律乙辛因得君專權，竟致與后族爭勢，誣皇后與伶人通奸，逼死皇后，又迫殺太子與其妃。這些單就中原儒教文化的觀點，或契丹遊牧社會的觀點，都是不可能發生的。惟有契丹接受中原文化以後，這些陰錯陽差的事情，才會發生。（註58）

總之，遼朝初期選用韓延徽、康默記、韓知古輩，建立漢城，種植蔬菜、設立五京（註59）等等，尚有偏重招徠漢人，使爲我用的意思，不一定是接受漢化。但是到了燕雲割讓、澶淵盟約以後，迫於實際需要，乃由分治走到合流。澶淵盟約後百餘年的安定，無意中構成番漢融洽的橋樑，對於契丹漢化，實在是一個最明確的里程碑，此則無庸置疑。（註60）

陸、西夏的漢化

十一世紀前期，自漢唐通往中亞和歐洲的絲路上，出現了一個強大的帝國——西夏，歷經十個皇帝，長達一百九十年。在立國前期，西夏曾與遼朝、北宋鼎足而三，雄踞一隅，後期雖不如前期之盛，仍能與南宋、金朝並列，直到蒙古揮兵南下，一二二七年爲成吉思汗所滅。

研究西夏早已儼然成爲一種專門學問，（註61）然先生對此關愛不多，僅提及：

（1）西夏皇室自拓拔思恭因唐末有功賜姓李以後，世代皆以李姓著稱陝北寧夏區，沿襲至李繼捧、李繼遷習用未改。所據地域雖荒僻，但習俗已與漢人相同。政治雖對宋保持獨立，文化則已漸趨混合，與中原漢族略無區別。（註62）

(2)李元昊勸父德明絕宋自立。德明曰：「吾族皮毛之外得衣錦綺，皆宋恩也」。又元昊本人自己通習番漢文，習漢人文化。他的繼任諸帝，如李諒祚（元昊之子）、李乾順（諒祚之孫），更是尊崇孔子，模倣漢人制度，唯恐不肖。（註63）

(3)李元昊建國時，採行漢唐制度，如仿中華朝儀立文武班級，改元建號，追諡祖考。採行漢地官制，設立中書令、宰相、樞密使等官，任番人漢人分掌各職。設立番漢學，翻譯孝經、爾雅、四子書，供國人讀。（註64）

(4)由是知西夏對漢唐制度，內地習俗，是自動採用的，自不免因時制宜，有所損益；不過大體上，仍然保持東亞儒教文化的型態。（註65）

柒、女真的漢化

十二世紀初期，女真崛興東北，阿骨打（金太祖）、吳乞買（太宗）指揮女真少壯軍人，用兵無敵，滅遼（一一二五）、破宋（一一二六），短短十年內（一一一五～一一二六）把新興的金朝，從吉林哈爾濱擴張到淮水流域。北宋歷年二百（九六〇～一一二七），文化昌盛；轉瞬之間，國破君囚；徽宗、欽宗與一部分臣僚，數千貴族，歷代文物國寶，盡成俘虜。靖康之辱，至今悲痛。當時漢人的倒楣，可說是已到極點了。女真氣燄，不可一世。他們居然能在趾高氣揚的時候，瞧得起中原漢文化，應當是有特別理由的。（註66）

一、十二世紀初期上京女真文化略說（註67）

公元第十二世紀上半期，東亞女真族的精神與女真文化是可以劃成一個獨立單位的。她是半遊牧、半農耕的東夷一族（通古斯族），介於大海與東胡遊牧民族之間，南與中原農業社會隔海相通，壤地相接。地理環境：跨海擁陸，山岳、草原、沼澤、平原相間，氣候嚴寒，資源宏富，人物雄傑，思想敏銳。自古為東亞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構成的一個重要支流。「渤海國」、「金朝」、「清朝」，就是這一支在國史上所建立的朝代。自阿骨打建立金朝到海陵帝遷都燕京，這三十八年（一一一五～一一五三），稱為「金朝建都上京時期」。此時

期，「俗本驚勁，人多沉雄」。「將勇志一，兵精力齊」。十年之間，創興大國，黑水白山區域民族沉雄精神的發揚，實以建立金朝的女真人為最早代表。

十二世紀初期的女真族，除上述本有的特殊性質以外，民間一般社會活動，也有許多特殊的習慣，特殊的生活方式，我們稱牠為女真舊有的文化。但是這些女真舊有的文化，若詳加分析，也各有來源，不全是土生土長，有些是女真族固有的，有些則是女真族因襲東北區域其他民族的。起於本族固有者：

- a.國初即位儀：《金史》阿骨打的即位皇帝是女真舊有的習慣；
- b.信巫與崇尚珊蠻教：相傳發源於索倫族的沙漫教(Schama-nis mus)（巫教），在文獻上原來是起於女真的；
- c.射鹿與哨鹿：射鹿為女真的特長，故哨鹿也是女真的特技；
- d.燒炕與用炕代替桌椅。

因襲其他東北諸族者：

- a.拜日與東向受賀，則是因襲匈奴、烏桓、契丹的舊俗；
- b.春夏捺鉢，則係繼續遼朝舊有的習慣；
- c.髡面：這是匈奴突厥共有的風俗；
- d.燒飯：《三朝北盟會編》（一一一）：「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與所乘鞍馬以殉之。所有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燒飯雖盛行於金朝，但亦為遼朝契丹舊俗。
- e.辮髮：也是東胡族的舊習慣。
- f.其他如蒸報關係、斡耳朵、世選等，東北古民族的舊風俗，女真人也均有之。（註68）

二、女真族與中原文化的彼此接近

十二世紀的女真族何以在文化上、種族上和中原漢族容易接近與容易混合？推究其原因，計有：

(1)由於女真族與漢族通婚的頻繁：女真族與漢族的通婚是先從貴族作起的。當時就一般狀況說，東北女真族武力雄強，中原漢族則物質生活與文化教育較優。女真人入主中原以後，搶掠物資以外，貴族武夫掠取漢婦成爲一時風尚。女真貴族既以娶漢婦爲風尚，倘遇到所娶漢婦出身士族，如金世宗的母親貞懿皇后，則整個家庭的習慣風尚是都會隨著漢化的。

(2)由於東北與中原地理環境的大同小異：就天然環境說，當時漢人分布的主要區域是在黃河流域，遼河流域次之，生活方式全屬農業社會。女真文化發祥地（哈爾濱附近一帶）是黑水白山區域，在當時是半遊獵半農耕的社會。女真人的生活方式雖介於蒙古與漢族之間；但天然環境有山有水實與中原比較接近。十二世紀初期，黑水白山區域尚未開闢，氣候嚴寒，物產不豐，女真人生長其間，強悍有餘，安逸難得。他們甘心全盤接受中原漢化，地理關係的接近，應當是主要原因之一。

(3)由於種族血統的接近與歷史往來關係的親密：我們懷疑黑水白山的女真族有若干部分是由山東半島漂海轉徙到東北去。雖然這方面的實在情形尙待發見與證明，但可能性確是很大。至於就歷史說，女真與漢族素爲鄰國，年深久遠，朝貢向化仰慕已久。一旦南入中原，真不啻窮鄉僻壤的惡霸土豪驟然遷居通都大邑，自不免衣履一新，競趨時髦，選置甲第，姬妾滿前，大大享受一番了。女真族的初期接受漢化，大約類是。（註69）

三、女真族逐漸漢化的主要原因

十二世紀初期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在東亞歷史上尙是一群新興的民族，所以當時被稱爲生女真。生女真就是不常見的女真或不成熟的女真。《金史》（卷一）〈世紀〉所說的黑水白山區域，在當時也是尙未開發的地區。這個地區在國史上，雖說久已著名（先稱肅慎、勿吉、後稱靺鞨，金朝祖先即是出自靺鞨的黑水部），早已連成一體。但有系統的設置郡縣列入正史，則也和熱河遼寧相似，始於契丹族建立的遼朝和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註70）這個得天獨厚的地域，開發比較稍遲，因而他們自己並未能擁有一部整套的文化，這自然是一個缺憾。（註71）

然而，十二世紀初期的生女真人，沉雄志專，勇猛力齊，不畏勞苦，多所建樹。綜合觀察實在由於民族智慧，克難意志與地理環境三者互爲因果造成的。他們生長在黑水白山，隔唐遠漢。因爲天寒產薄，非勞苦筋骨不足以裕生圖存。故

能勇悍善戰，舉世無敵。又因開化較遲，沒有很多傳統習慣的拘束。故能對於外來文化，隨取所需，擇善而從。假使這種文化，對己方便，可以利用，有時即心悅誠服，無條件的捨己從人。我們研讀《金史》所得的第一個印象也就是女真族對中原漢化全盤接受與認本家的態度，儘管漢人（宋人如胡銓等）罵他們是北虜，是夷狄；他們也將漢人與女真人分別得清清楚楚；有時也想自找出路，兼採遼、宋，「因時制宜，另成一代之法」（《金史》卷七〈宗憲傳〉）。但是對於中原漢文經典，中原傳統文化，一旦感覺優於自己，即大大方方，坦然包容，認為與他們是息息相關。全盤接受漢化的態度，不但海陵帝、金世宗熱心執行，惟恐不類。就是太祖阿骨打與金初元老重臣像粘罕（宗翰）、斡木（宗幹）、謀良虎（宗雄）、斜也（完顏杲）、完顏勗、完顏希尹等也認為改善女真舊習，因仍遼宋成規，乃是理所當然。（註72）

四、女真漢化進程

阿骨打時代（一一一五～一一二三），女真族自己原有一套半游牧、半農耕的文化，並擁有一支相當堅銳的騎兵，稱為「猛安謀克」。（註73）阿骨打即與他的兄弟吳乞買（金太宗，一一二三～一一三五）利用這股新興精銳的武力，打垮了遼朝，擊潰了文物興盛的北宋。吳乞買天會時期，俘獲遼主天祚（一一一五），攻陷東京，擄走徽欽二帝（一一二七），把帝國的疆域，從哈爾濱擴張到淮河流域。

女真族在文化方面，較北宋落後，所以初期尚不敢直接統治中原（特別是黃河以南），乃利用漢奸張邦昌、劉豫，實行為期十一年（一一二七～一一三七）的間接統治。因為要穩定黃河以北，鞏固東北（舊日的遼朝）基地，乃選用遼宋降臣韓企先、時立愛、宇文虛中、蔡松年等，採行漢地文化，革新國內政治。所以天會時期對女真建國而言，是一個轉變的時代。

當時中原文化，在東北傳播已久，勢力雄厚。而圍繞在新興女真領導集團左右，向他們灌輸漢文化的，約有三個集團：

(1)已受漢化的契丹人、渤海人，以耶律恕、移刺溫、蕭仲恭、高慶裔、耶律余睹、郭藥師等為代表；

(2)契丹系的漢人，以韓企先、韓昉、時立愛、劉彥宗等人爲代表；

(3)北宋系的漢人，以宇文虛中、施宜生、蔡松年、鄭瓊等人爲代表。

當時協助女真人採行漢化的高級將吏，以渤海人、契丹人爲輔佐，而以契丹系的漢人爲主幹。凡南征時的嚮導、中間人、翻譯傳達意旨人，前線打先鋒，當前站的人員，如耶律余睹、郭藥師、高慶裔、蕭仲恭等，均由渤海人、契丹人擔任。凡是留在中央繼續維持行政機構，實際秉承女真人意旨，管理遼領漢地政治與新得地區的政治，則由劉彥宗、時立愛、韓企先、韓昉等擔任。就中後者學識既高，又係本土人，賢才濟濟，故勢力尤大。至於由北宋投降金朝的漢人，則因宋未盡亡，自始就被歧視，他們的被引用也遲在劉豫被廢以後。這些人既是東北及燕雲地區的土著，自有廣博的學識、深厚的社會基礎。女真人在當時接受漢化，遠較契丹人爲易，即賴有這些人的協助。

女真建國後採行漢化的次第，略述如下：

(1)接收遼、宋地區的統治權，不使中斷。逐漸改變女真舊有的部落統治，使成爲農業社會的「官吏統治」。並在女真部落推行教育、救濟、勸農、考課制度，使人民生活日趨進步。

(2)漢官制的採用。阿骨打初定燕京（一一二三）用漢官爲宰相，始置中書省樞密院於廣寧府，太宗初移於平州。及蔡靖以燕山府投降（一一二五），因又移置於燕京。凡漢地選授官吏，調發租稅，漢宰相時立愛、劉彥宗、韓企先輩皆承制行之。大定十一年（一一七一），且圖臣像於衍慶宮。大抵漢官制之立，自平州人不樂爲猛安謀克始。天輔七年（一一二三）始以左企弓行樞密院於廣寧，尙踵遼南院之舊。天會四年（一一二六）始建尙書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頒新官制、換官格，除拜內外官，定勳封食邑，而後其制始定。然大率皆循遼宋舊。官制是表面的，然可以指示女真人政治、文化、經濟諸方面情勢演變的步驟。

(3)北宋圖書文物的北遷。《金史》（二十八）〈禮志〉：「金人之入汴也，時（北）宋承平日久，典章禮樂粲然備具。金人既悉收其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時方事軍旅，未遑講也」。「皇統間熙宗巡幸析津（北平），始乘金輅、導儀衛、陳鼓吹，其觀聽赫然一新，而宗社廟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此證自破汴鹵獲北宋文物及俘獲多數文人學士之後，女真已直接學習宋人，採用漢化。（註74）

五、金朝與長城

女真族在第十二、十三世紀，蹶興於黑水白山區域，建立金朝（一一一四～一二三四），統治我國的東北三省，及熱河、燕雲和黃河、淮水以北，歷時一百二十年，他們對於長城的認識，比較遼朝更為模糊，可以說沒有直接的關係。簡單的說，金朝女真人對於長城，第一期（阿骨打、吳乞買時期）印象是模糊的。第二期（世宗，章宗以後）女真人曾利用漢人修長城的智慧與技術，在更遠的東北與北邊興建了許多界壕（有時也稱為長城），想利用這些界壕去阻止來自更北邊的敵人。（註75）

六、長江天塹阻止女真的擴張與拯救南宋

一一二六年以後，女真南侵的對象是文弱分崩的南宋，依照當日客觀的情勢，當年新興的女真族是可以統一中國的。但是他們佔領開封以後住手了，沒有達成統一的任務。推究其原因，一半是女真人發展的太快，沒有統一中國的準備，一半是長江天塹阻止女真的向南發展。

長江防禦北方騎兵的入侵，南北朝時已屢著功效。到了女真南下，因長江阻隔而遭停頓，更是有目共睹：江淮為東北騎兵由北南侵的天然防線。時舟船狹小，淮水縱橫，江面廣寬。江淮表裏，自古為天險。東北遊牧民族，到此遭受阻止，勢有必然。不但女真不易渡江，即是代替女真族的蒙古人，初到了江淮，也是毫無辦法。江淮暑濕，對東北遊牧人自是一種苦惱。再加以河流交錯，馳驅不便。糧儲不易，飲食不慣。故金兀朮與韓世忠相峙於江上，每見宋人駕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宋史》三六四〈韓世忠傳〉）江南地域廣闊，兵少不易見功，人眾糧運難給。西元一一六一年（海陵正隆六年，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海陵聚兵六十萬，號稱百萬，欲渡江滅宋，統一海內。但渡淮以後，前阻大江，後無糧草，終致失敗（即《宋史》所謂「采石之捷」）。

總之，南宋高宗的中興與金陵南侵的失敗，原因固然甚多，但長江寬廣，阻擋住女真人的馬隊，使他們不能任意攻掠，則是一個最大的原因。這不能不說是

地理環境保障了中原民族的歷史，使中原民族的歷史因以免除十二世紀女真游牧民族的破壞了。（註76）

七、金世宗採行漢化的成功

金朝史上有兩個時期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一個是太祖阿骨打（一一一五～一一二三）與太宗吳乞買（一一二三～一一三四）時期金朝國勢的擴張；一個是以世宗爲中心的大定（一一一六～一一八九）明昌（一一九〇～一一九五）時期金朝文治的興盛。（註77）對於十二世紀初期，女真族國勢猛暴的擴張，前述已詳，不再贅敘。至於說到以金世宗爲中心的大定、明昌四十年間，女真族兼統中原以後的文治興盛，國內與國際間的和平安定，則是歷史上值得稱道的偉蹟（大定年間，《金史》稱爲「小堯舜時期」）。建立金朝的生女真人是第十二世紀初期，東亞松花江，黑水白山區域半游牧半農耕的野蠻民族。「小堯舜時期」居然能在生女真族入主中原五十年（一一一五～一一六一）間出現，這是有特別原因的。

金朝第五位皇帝金世宗是太祖阿骨打第三子宗輔的兒子，母親李氏（《金史》卷六十四〈后妃傳〉稱爲「貞懿皇后」），出身東京（遼陽）士族，是一位美麗而有賢德的漢人。因此他幼年時期同時能受到漢族文化與女真文化的薰陶。他又身經種種苦難，利用智謀得以免除熙宗與海陵帝之疑忌，及至乘時自立，乃能勤求治道，留心庶政，造成大定三十年間金朝史上的黃金時代。

金世宗是國史上外族統治中國皇帝中，一個最肯用心作事，最有見解，並且眞心想解決問題的人。他受的是雙重教育，所以他用心考慮的問題也是多方面的，有時也是超種族的。他研習漢文經典與歷史，所以他常思念《詩經》、《書經》、孔子、孟子及古書中的訓言；漢文帝、唐太宗等的行事。與宰執大臣共相議論，力圖仿效。另一方面中原漢人的因循苟安，文弱萎靡，自私自利，遊惰奸詐，他也深惡痛絕，每思有所矯正。他是長於騎射，熟習女真舊俗的，因此對於女真人的純樸篤實，習射尚武諸美德則深懷眷念，常思保守毋失，以補救中原文弱的不足。他對於女真舊俗與中原文化的態度，都有所推崇，也都有所批評；有所選擇，也都有所遺棄。

金世宗對於漢化的基本態度是擇善而從。我們統觀《金史》（卷六至卷八）世宗本紀及有關諸臣列傳，更覺得他對漢化的了解，有時且超過擇善而從的程度，竟是精益求精，感到美中不足；不是吹毛求疵，漠不相關。塞外可汗入主中原，對於漢地傳統文化了解的透澈，奉行的誠懇，大唐帝國以後，應以金世宗為最早的一人，也是最成功的一人。他對於繼承漢化，不像遼聖宗的徒慕華風，毫無實際，也不像元世祖的利用一時旋即棄置。他對於繼承漢化的兢兢業業，一如承受先世祖訓。這樣的誠摯，怕只有清朝的聖祖、高宗可以相比。先生認為東亞中華文化主流是漢唐宋明，第二主流應當屬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清朝，理由即在此。

《金史》（卷八）〈世宗紀〉有一段總評，對他推崇備至：「當此之時，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他何以能有這樣的文治成績呢？詳加推究，約有下列三個原因：(1) 得力於賢母良妻的教導與鼓勵；(2) 得力於他一生處世謹慎與勤求治理；(3) 得力於他對於中原文化有澈底的了解和身體力行。他能兼採女真尚武習勞，剛勁沉毅的美德，配合中原漢唐納諫任賢的君道，科舉重士的國策，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的政治，因此能博得「群臣守職，家給人足」小堯舜的美稱。至此金世宗採行漢化的大告成功，應當是人人公認的事實。（註78）

八、女真漢化得失

十二世紀的女真人雖秉有模倣的、選擇的精神，但並沒有自生自長的文化。也正因為自己沒有定型的文化，所以更發揮了長於模倣的精神。上京時代的女真人，大概騎射田獵，習勞善戰學自室韋、契丹；耕田績麻、宮室城居學自中原漢人。因為氣候嚴寒，人多沉雄，所以學的相當到家。因此得以戰勝攻取，十年之內創建大國。又因比較重視中原文化，所以世宗一朝，得到了「小堯舜」時代的美號。但模倣總是有限度的。模倣成功，如世宗時代的文治，自可招致一時的小康。但終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時候過了，也未免水涸葉凋。女真人十三世紀中葉以後，大部份轉變成廣義的漢人，歸入中原文化，即是根本未立的結果。（註79）

九、道教在金朝的發達與全真教的創興

道教在金元時代，最爲發達。其中全真、真大、太一均創立於金代，盛行於元初。道教何以在金初如此發達？何以同爲道教，並時興起而彼此不相統屬？上述問題的答案，先生認爲道教在金朝初年發達的原因與當時的政治有密切的關係。金朝是異族侵入中國，中原人士目睹祖國的淪亡，不堪外族的欺凌，隱身道院，皈依宗教，原無足奇。後讀顧嗣立《元詩選》、商挺〈題甘河遇仙宮〉詩，知道創立全真教的王嘉、邱處機，不但是賢者避世，而且有反抗異族，保全漢族文化的積極行動。

全真教主張儒釋道合一，目的既不在宣揚傳統的道教，或者有保存全民族傳統思想的意味。何況創立全真教的重陽王真人，他既不教人祈禱唸經，也不教人煉丹畫符，而只教人誦讀道德清靜經、心經、孝經，實在有保存三教精神（漢族文化）的意思。凡此皆足以證明全真教不是宣傳道教，而是利用道教的名義，對金初外族的壓迫，有所補救。從消極方面說，道儒釋三教並重，勸人讀道德清靜經、心經、孝經，使人略知道我祖我宗在信仰上沿襲遵守的精神。從積極方面說，可以救濟眾生，使文士有所隱避，外族的摧殘可以減輕。

總之，金有中原之時，豪傑奇偉之士，不肯臣事外族者多，實不止王重陽一人。此輩都能利用北方遊牧民族重視宗教的心理，「自異於流俗，聯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變」。這種舉動，用舊話說是獨善其身，不事異族。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具有民族思想，保存民族的人格，不當漢奸，不與外族合作。金元名士如元好問、劉祁、商挺、姚燧、虞集等對於當時道家者流的感化能力，表示推崇。他們是享盛名的士大夫，當然不滿意於儒家以外的異端外教。他們的推崇道教，不正可以看出全真教適應時代需要，對於當時的社會與民族有偉大的貢獻嗎？因此，在東方各派消極的宗教之中，全真教實在是一種比較積極的救世宗教。（註80）

捌、蒙古的漢化

先生在德國多年，從海尼士學習蒙古文，並研究《蒙韃備錄》及《黑韃事略》兩書，對蒙古史下過很大的功夫，（註81）發表這方面的論著也最多。先生

研究蒙古史的動機，是從世界文化史，或是東西文化交流史方面，來研究蒙古（或擴大的來說北亞遊牧民族）對於世界史的影響。（註82）故先生潛心研究蒙古初期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種種問題，顯然是在為蒙古與中原漢文化的差異所形成的衝突，作為和平共存的試探，俾能「從中國傳統的儒家大同文化和邊疆文化的交流過程中，及中國文化對於邊疆和鄰邦的影響裡，來探究中國文化的基礎」。（註83）

一、元朝與長城

元朝與長城的關係，也是消極的。元代並沒有注意到如何修建長城，如何保護長城。成吉思汗只把長城當作「內地」與塞外分界的一種標幟。因此他把對中國應作的事情，分成兩個步驟。第一步是先把塞外各遊牧部族統一。第二步再來考慮如何處理內地，或長城以內的事情。忽必烈對治理大元帝國，效法契丹，把長城以外，長城以內，分成兩個區域（即所謂元代的兩元政治），也與此一認識有關。（註84）

二、元朝的通事

當蒙古勢力初入中原時，高階層譯人或通事，多數是已漢化的女真人。一般社會與中下層的譯人與通事，似乎大多數是回回人（應是指畏兀兒人）。當時，這批人到處胡作亂為。至忽必烈始深切了解通事的重要，很用心的興設學校，有計畫的培植翻譯，使他們成為好的通事和好的了解中原文化，溝通中蒙文化的中間人。又忽必烈曾延接四方文學之士，已有講經論史的意味。到了泰定帝（一三二四～一三二七），選任王結、虞集為經筵講官，天子駕幸上都，二人常執經以從。但替蒙古皇帝講經說史，需要翻譯，自然講官也變成了高等的通事。（註85）

三、成吉思汗的接受外族文化

法國格魯賽 (R. Grousset) 教授對於成吉思汗喜歡引用異族賢哲，曾有很公正的評論。他說：「成吉思汗雖然是一『殘忍』的政治家，但他對於同時代文明人的經驗，並非扞格不入者」。(註86) 說到成吉思汗左右的親信，除蒙古部族以外，當時任職汗庭，參與謀議，分擔政治、軍事、文化工作，有時且能貢獻意見的外國人，堪稱智囊團人物的，據《元史》、《元秘史》等所載，數量的確相當可觀。在他的這些智囊團中，對於維護東亞儒家大同文化特別有貢獻的，要推下邊的兩個人，一個是精通儒學、佛學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一個是主張儒道佛合一的全真教大師邱處機。(註87) 由於耶律楚材的「相業」(或者說他對於漢文化的匡救事業)，均在一二二九年以後，窩闊台大汗時代，本文將於下節討論，此處專述邱處機與全真教在十三世紀對於民族劫運的匡救。

邱處機是山東登州棲霞人，生於金皇統戊辰(一一四八)，死於元太祖二十二年丁亥(一二二七)，年八十。《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傳〉中有傳。處機年十九(一一六五)習全真教，師事重陽王真人^{王喆}，真積力久，學道乃成，是全真七真人之一，著有《磻溪集》十卷。為全真教第二代的大師，同時也是北平白雲觀的創建人。靈蹟異事甚多，在金元交替混亂時期，創教渡人，貢獻甚大。(註88)

長春真人與成吉思汗的關係，應以《西遊記》(註89)中所述的「雪山講道」為中心。(註90) 邱處機當蒙古鐵騎初入中原時期，能以七十四歲高年，西行萬里，三次雪山講道，勸導成吉思汗清心寡慾，止殺、止獵；教孝、愛民，真是難得。(註91)

金元之際(一二一一～一二五九，自蒙古人入關到蒙哥汗的死)，蒙古騎兵蹂躪中原，實為東亞儒家大同主義文化的又一厄運。中原人民得免浩劫，未蹈同時代中亞、前亞花刺子模、報達殘破毀滅的命運，邱處機的西行謁見成吉思汗、雪山講道、隨軍說教，贏得大汗教主的待遇，因以建立了蒙漢兩大民族間的友好合作，實為重要關鍵之所在。(註92)

四、耶律楚材與元太宗（註93）

耶律楚材是契丹人，遼朝的貴族，人皇王突欲的八世孫，金宰相耶律履的兒子。生於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死於元乃馬真皇后稱制的第三年（一一四四）。他博學能文，精研佛儒，兼通天算、醫藥及契丹、蒙古語文。貞祐二年（一二一四），金宣宗遷汴，次年蒙古入燕，楚材身經戰亂，專心學佛。一二一九年太祖（成吉思汗）西征花刺子模，耶律楚材從行，掌天文占卜。西夏人常八斤善造弓，見知於太祖。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而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治天下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成吉思汗聞之甚善，日見親信。一次西域曆人奏：「五月望日後，月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望日）楚材說：「月當蝕」。西域曆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八成。成吉思汗因曰：「天上事汝尚知，況人間事乎？」丙戌（一二二六），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集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由此二事，大見信任。太祖常指楚材對窩闊台汗說：「此人天賜我家，今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

西元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死，又二年（一二二九）蒙古召開「庫里爾台」（宗親大會）大會。耶律楚材告察合台汗說：「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眾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國朝（元朝）尊長有拜禮，自此始」。窩闊台即大汗位後（《元史》稱為太宗），蒙古對外戰爭又復開始：

- (1)他首先提議伐金，分道進兵，假道南宋，一二三二年敗金兵於三峰山，三月進圍開封。初次使用火炮，金人堅守十月，破之。金朝旋亡（一二三四）。
- (2)一二三一年征高麗，取四十餘城，國王逃至江華島。
- (3)平定花刺子模餘部。
- (4)派拔都、速不台統長子軍征東歐，佔領匈牙利與東普魯士，一二四二年始撤兵。

這時候，蒙古人擁有中原各地，但初無統治城市的經驗。幸賴耶律楚材居中調度，多方維護，中原傳統的制度與文化，方得保全。茲舉三例，作為說明：

(1)中使別迭倡議廢棄漢人，毀滅城市，使草木暢茂，以增廣蒙古人的牧地。耶律楚材則建議，不可革變太過。漢地富饒，若善於利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以濟國用。窩闊台准許試辦。一年之後（一二三一），米穀滿倉，金帛陳於廷中，悉符原奏之數。太宗大喜，即日拜楚材爲中書令。

(2)蒙古兵初入中原，惟事進取，諸將士佔領土地，因以與之。於是一社一民，各有領主，州縣割裂，不相統屬，中原大擾。甲午（一二三四）詔括民戶，以斷事官（大汗的幕僚長）失吉忽突忽領之。又四年（一二三八）忽突忽以民籍至，太宗初議如蒙古法，割裂州縣，分賜親王功臣。楚材以爲不可，力爭。認爲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主張多與金帛，以滿其欲。太宗曰：「已許，奈何？」楚材建議：「朝廷代爲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不得直接橫徵暴斂」。太宗然其計，由是中原州縣制度，得以保全。

(3)時蒙古西域勳臣均主徵收中原賦稅，應以丁爲戶（單位）。楚材力言其不可，朝臣則說：「我朝（蒙古）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舍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將不勝追理！」朝廷鑑於漢地民丁的易於逃散，「卒從公議」。

其餘楚材主張實行考試制度，招徠知識份子參加地方行政，一次最多者，即錄取四〇三〇人。又設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選儒士編輯經史。總而言之，他對於元初保全漢地舊有文化，實在貢獻甚大。

五、元好問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

金元之際，漢地學者在此一混亂時期的行動與態度，大致可分爲河塑型與狹義的中州型（後者大都是亡金的士大夫）。河塑型以許衡、姚樞、劉秉忠爲代表。亡金學人則以元好問爲祭酒，而封龍三老（元好問、張德輝、李治）比較上往來更爲密切，行動上也比較更爲積極。他們眼見金朝亡了，新朝的國是猶未穩定。不得已只有一方面會集志同道合的人，聚徒講學於封龍山，以期學業有所繼續。一方面運用種種方式，隨機應變去說服蒙古新朝，企圖得君行道，稍稍挽救金元之際，北族蒙古人入主中原後，中原傳統文化所遭遇的劫運。他們都是富有經世與救世思想的，並且也了解如何宣揚孔教與如何努力救濟知識分子。所以召

對時，不免互相援引。一遇機緣，即很自然的推尊孔夫子與極力薦舉人才，希望從宣揚聖人，救濟知識分子作起，進而希望對於民族傳統文化，多所保存，因此之故，當時有實力的耶律楚材、忽必烈、史天澤輩，都是他們努力爭取的對象。這些人中，群推一時祭酒的元好問，當代領袖，眾望所歸。不但才雄學膽，詩文冠世，而且是親歷患難，憂世心切。他從一二三三年，在開封圍城中上書耶律楚材開端。中經參加封龍山的講學，與聞一二四七年，張德輝的奉召北上。直到一二五二年的隨從張德輝同赴和林，請求忽必烈允許為儒教的大宗師終止。他的苦心孤詣，為挽救並保全中原傳統文化所作的種種努力，實在是班班可考的。（註94）

1. 癸巳（一二三三）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

這一封書，就日後所發生的影響而言，直接救濟了金朝自大定明昌以來兩朝所培養的學者與儒士，間接保全與綿延了中國傳統的文化，極有歷史意義，值得加以特別的研究：

(1)他在大亂後百忙中，開列了當時有學識、有地位的學者五十四人，推薦給用事蒙古汗庭的耶律楚材，請他對於這些儒臣與學人加以保全，甚至加以選用。

(2)他不惜用最謙下的稱謂與語氣，誠懇的為耶律楚材講說人才培養的不易與選用卓越人才的有關國運。勸他為當代的蕭、曹、丙、魏，房、杜、姚、宋，利用這批人才對蒙古新朝有所作為。

(3)他再三指明，這五十四人皆天民中之秀傑，應當用於世。並且說：「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應當隨時選拔，使他們助成新朝的各種建設事業。

(4)他又很沈痛的說：萬一這些人不為世用的，他們也自能立言立節，報答閣下，不會默默無聞，與草木同朽。

因此，先生認為元好問的這一封書，是儒家大同文化在東亞昌盛綿延的一種重要文獻，無論就內容所含的哲理言，或者是就這五十四人日後所表現的事業與影響說，都是值得加以重視與表揚的。（註95）

元好問這一次挺身而出，保全士類，與維護中國傳統文化，大義凜然，極為成功。不但原書送出後，反應與效果均甚良好，即此五十四人的行徑，就歷史的價值說，據先生的考證，十之七八以上，都獲得了安排，而且當時蒙古人占領開封以後，不但沒有再事屠殺，且實行一種分批與有計畫的安置亡金朝士與三教醫匠等於山東、河北等地的辦法。指定若干地區，將這些人，暫時集中，稍加休息之後，再逐漸遣散，或分別安置。這一特殊措施，雖是耶律楚材的建議，或者即與元好問有重大關係的。（註96）

2. 同張德輝與忽必烈辯論金非儒而亡，因而說服忽必烈，使他擔任儒教的大宗師。

十三世紀蒙古族在東亞的統一中國與在世界歷史上的成就，可以說始創於成吉思汗，繼承於窩闊台汗，完成於忽必烈。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忽必烈在久亂思治的金元之際，認清楚當時撥亂反治的機運，招納中原漢地各方面的學者，商討如何安定東亞中國的大計，採取了與漢地學者合作，以漢治漢的兩元政策。忽必烈這一轉變與這一事業的奠定，也與當時的大詩人元好問有關。先由張德輝、元好問的勸說，建立了忽必烈信奉孔子的認識，而後方有各地儒士風起雲從，恢復漢地漢法的事業。

女真自世宗大定（一一六一）以來，奉行儒教，信用儒士，結果女真亡了，這是不是任用儒士的結果呢？（實際上，在當時也確有「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流言）這一問題是一二四七年，忽必烈親自向一位被徵召到和林的漢地儒者張德輝提出來的。

張德輝、元好問、李治三人當年以封龍山為講學聚會的中心，志趣相投，如何救濟世人，如何應付新興王朝，如何得君行道，自然是彼此常常討論講求的。「金朝不是用儒而亡，新朝更應重用儒士」。這是他們早已研討過的問題。先期已有準備，所以一旦觸及此一問題時，張德輝自然如數家珍，侃侃而談。又因他

是尊信元好問的，所以遇到忽必烈訪問中國人材，張德輝即首先舉出元好問、李治，等到張德輝致胙於王，遊說忽必烈尊崇孔子業已成功，得到忽必烈「自今而後，此禮不廢」的允諾以後，又過了五年，到了壬子年（一一五二），德輝偕同元好問，二次北覲，正式奉啓，請求忽必烈爲儒教大宗師。既到「王悅而受之」，第二步目的已達，乃又進一步，正式要求蠲免儒戶兵賦，忽必烈一一都答應了，「王爲降旨，仍命德輝提舉真定學校」。這一說服工作，方全部告成。（註97）

3. 元好問對於中國歷史學的貢獻

元好問既有文才，又有史識，同時又是博學而工作興趣濃厚的歷史家，他念念不忘修史報國，晚年曾親自動手編纂金朝的歷史，寫了很多的稿子。所作「壬辰（一二三二，金蒙決戰之年）雜編」，雖然已經散失了。但元朝人纂修《金史》的時候，曾加以利用，所以現存的金朝史，在元人所修宋遼金三史中，比較上獨稱完善。又據施國祁的研究，金朝亡後，金朝實錄幸能保全，也是元好問指示的功勞。實際上元好問對於傳統歷史學的貢獻，尙不止此，他對於傳統史學所尊信的「直筆」與「徵信」，也有很卓越的表現。舉例來說，那就是他對於賈益謙批評《金史》記海陵帝事不可信的支持與擁護。（註98）

六、孔元措與「衍聖公職位」在蒙古新朝的繼續（註99）

儒釋道三大宗教原是東亞中華儒教大同文化的三大支柱。論基礎與歷史，自然以儒教爲第一，佛教次之，道教一向被士大夫所輕視。但蒙古四大汗時代（一二〇六～一二五九）的太祖太宗時期（一二〇六～一二四六），則全真教（新道教）比較最爲活躍，佛教次之，儒教則甚爲暗淡失色。到了西元一二三三年，蒙古軍佔領開封，摧毀了殘餘的金朝，因有名詩人元好問的說項，當權派耶律楚材的多方努力，找到了衍聖公孔元措，正統的首席儒教，方漸漸獲得承前啓後的繼續存在。

孔元措是孔子的五十一代孫，他的再度得爲蒙古新朝的衍聖公，當歸功於下列的三個因素：

(1)由於中原儒教傳統勢力的雄厚，因而有元好問、耶律楚材與姚樞等，對於孔元措的推薦；

(2)由於蒙古可汗素重信仰自由，對宗教普遍尊敬，沒有成見，故太宗、憲宗、忽必烈，雖另有信仰，而對於正統儒教的恢復，視為當然，無形中給予了同情與維護；

(3)由於孔元措，在當日學術界頗有地位，人事關係亦佳；他自己又是有識見與有能力的人，因以獲得蒙古可汗的信任與朝野人士的推戴。

孔元措入元朝繼任衍聖公以後，曾努力為蒙古新朝制禮作樂。曾請求徵集太常已散失的禮官、樂官與樂工，在曲阜為朝廷訓練一種樂隊，演習登歌樂等。協助蒙哥汗（元憲宗）三次祭天。同時也努力從事曲阜孔林重建的工作。

七、元世祖忽必烈與漢化

西元一二六〇年（南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古忽必烈大汗（元世祖）繼承乃兄蒙哥汗（元憲宗）君臨北部中國（包括內外蒙古、東北四省、廣義的中原——指長城以南長江以北，三大區域），開始有計畫的採行漢唐式的中原文化。首先建元中統，四年後改為至元。同時立太廟，定朝儀，改官制，興禮樂。優禮賢士，選用英俊，秩序日復，漢地漸治。一二七一年（至元八年十一月）又正式下詔，建國號曰大元。又五年（一二七六）北兵入杭州，宋德祐帝投降，至是分裂三百七十年（九〇七～一二七六）的中國，復統一於忽必烈大帝。這真是中華民族歷史中的一個劃時代的新局面。第一、從東亞中華文化區域內的歷史說，整個中國統一於入主的邊疆民族，忽必烈時代所建的大元帝國，尙是破題兒第一次。第二、忽必烈所建的元朝，是漢唐文化與蒙古武力的配合。因為忽必烈大度虛心，運用得宜，所以大元帝國（元朝）時代，一方面武功卓越，疆土擴張，比較任何朝代均為強大；一方面就典章制度與文化藝術而論，不但拓跋氏所建立的後魏，高歡、宇文泰所建立的北齊、北周，望塵莫及；即是大唐帝國瓦解（九〇七）以後，蹶起東北的契丹族、女真族所創建的遼朝、金朝，也不能與統一後的大元帝國，等量齊觀。這自然是國史上的奇蹟之一。我們推究這一奇蹟的由來，

自不能不歸功於忽必烈大帝的因時制宜，能將蒙古的武力，與中原已具規模的漢唐文化，互相配合，使民族智慧與民族武功發生團結合作的力量。（註100）

1. 採行漢化的契機

金元之際（一二一一～一二五九），一二一一年，蒙古兵初入長城，是為蒙漢接觸的開始。到了忽必烈時期，已將滿五十年，採行漢唐儒教大同主義的文化，包括尊崇孔子與實行儒教的文物制度在內，至是已逐漸成熟。元世祖時期漢地學人與蒙古當權派的大舉合作，實在也只是「因時制宜」，完成時代所付與的使命罷了。這一點就元初現存史料說，也可以獲得充分的證明。現在《元史》二百一十卷，元初直接史料，如《蒙古（元朝）秘史》，《聖武親征錄》，邱長春的《西遊記》、《磻溪集》，耶律楚材的《西遊錄》、《湛然居士集》，以及南宋使臣像趙珙的《蒙鞑備錄》，彭大雅、徐霆的《黑鞑事略》等等，這些書中，都有談到成吉思汗（太祖）、窩闊台汗（太宗）如何採行漢化，實行尊孔與儒教文物制度的問題。這個問題，在當時說，實際上是尚沒有形成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或者說開始引人注意，大概起於西元一二三四年蒙古滅金以後，長江以北的北中國，復統於一，自是歷史上一個新的局面的開端。元好問上耶律楚材書，提出了五十四人，認為這些人都可以為新朝輔佐，完成新朝應履行的使命。這個時期，不久即到元世祖忽必烈在甲辰歲（一二四四）開始「思大有為於天下」的時期，中原大好河山，歷三四十年而尚未安定，這自是蒙古人，北方的中國學人，亡金朝士，以及一小部分的西域人，所焦急不安的。忽必烈挺身而出，負起這個新使命，正符合各方面一致的希望。這些應該都不是偶然的，這是時代的因素。（註 101）

金朝既滅，新朝統治已成定局，因而各地儒家知識分子，漸有得君行道的要求，紛紛結社，各思以其道見用於新朝。於是藩府「分地舊臣」，如冀城董俊、董文炳父子，東平嚴實、嚴忠濟父子，定興張柔、張弘範父子，永清史天祥、史天澤兄弟，濟南劉伯林、劉黑馬父子，再加上以劉秉忠、張文謙為中心的邢臺派，以姚樞、許衡為中心的蘇門派，以元好問、張德輝、李治為中心的封龍山派，以王鶚、高鳴為中心的亡金降人。百花齊放，都思有以表現。所以忽必烈初

年的潛邸舊侶，有記錄可查的，即不下六十餘人。這些儒家學人，固然是響應了元世祖的尊孔優禮儒士的號召。反過來，也可以說，忽必烈的尊崇孔子，實行儒家學說，也由於各方學人的促成。互為因果，水漲船高，這些都應當歸功於人為的因素。（註102）

2. 對於漢化的態度與所遭遇的困難

忽必烈汗對於漢化的整個態度，是：

- (1)他生性仁明英睿，思大有為於天下。當時他感到漠南廣大漢地的不治，認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而延訪藩府舊臣（如董文用、趙璧等）及四方文學之士，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註103）
- (2)他知道治理漢地須用漢唐成法，又因邢州大治與關中大治兩個實例，更加強他對於選用漢人，恢復漢法可以治理漢地的信心。（註104）
- (3)他採行漢化，純為恢復漠南漢地的秩序，純為治理漢地。（註105）
- (4)他採行漢化是配合蒙古帝國的兩元政策，即是蒙古人除漢地採用漢法外，並未向蒙古和其他汗國，推行儒教，實行漢化。
- (5)他在漢地的宗教政策是允許儒釋道三教，照舊流行。同時於其他宗教，亦任人崇信。（註107）
- (6)他誠心求治，慎選通事與盡心培植溝通蒙漢關係的人才。（註108）

至於所遭遇的困難，有：

- (1)元初「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懷疑論；（註109）
- (2)元世祖與蒙古守舊派蒙哥汗對於治理漢地的歧見；（註110）
- (3)世祖左右嫉忌者對孔學的造謠中傷。（註111）

3. 所建元朝規模（註112）

統觀忽必烈所經營的元朝，規模宏遠，多彩多姿，就制度形態說，可以歸納為下列三大類：

(1)沿襲蒙古舊法，改良擴大而成為一種新朝制度者。在這一系統下，實施的政策，則有以下諸事：

- a.立站赤，廣驛道。
- b.尊國師，容異教。
- c.建兩都，時巡狩。這是塞北游牧捺鉢習慣與中原奠定國都的混合體制。夏秋駐上都（多倫附近），冬春駐大都（北平），元代各帝，遵行無改。
- d.盛朝會，頒章服。乍馬、質孫宴尤為有名。
- e.創文字，興學校。宣諭文告，以巴思八新字為主，各地仍是因俗而治，各以其本土文字副之。實在所注重的仍是各地本有的文字。

(2)採行漢唐舊制，隨時變通，而成一代典章者，則有下列諸事：

- a.建國號，選用大哉乾元的成語，代替因地得名的國號。但細一推究，元即是「玄」。「元朝」仍有北方帝國的意思。這些都是可以窺見當時漢地儒者與忽必烈汗委曲求全，努力合作的苦心。
- b.立行省，為吾國行省制度的創始。
- c.行鈔法，為採用信用貨幣制度的創始。
- d.廣運河，開鑿惠通河，既興水利，復助漕運。由郭守敬等主其事，實惠及民，公私稱便。
- e.定律令，如頒行元典章與通制條格。
- f.建太廟，忽必烈始用漢俗，崇祀祖先。這一點是以前蒙古人所忽略的。

g.勸農桑。

h.頒農曆。這些都是中原農業社會所極端需要，而歷代政府所極端重視，時時推行勸導的善政。忽必烈知之甚稔，皆不避諱議，承先啓後，竭力奉行，以慰眾意。

(3)元代忽必烈汗的新建設，而具有近代科學意義者，則有以下數事：

a.探尋河源。至元十九年（一二八〇）命招討都實率調查團尋求黃河水源，實具近代科學調查的意味。

b.開創海運，用專家朱清、張瑄等合力主持，暢通海運，南米北食。這樣民食充足，像當年華北大都（北平）人口動愈百萬以上的大都會，方可建立。

c.頒行新曆，採用阿拉伯人的算法，命郭守敬等主持之。

d.實行兩元政治，因時因地制宜，企求帝國的安定。

e.擴大世界交通。

七、其他（人物）事蹟

1.全真教與知識分子

金元之際，中原混亂，全真教因爲邱處機人格與智略的卓越，萬里西行，爲成吉思汗說教雪山，由是獲得大汗的信任（詳本文捌之三）。從此在漢地擴充道觀，拯救萬民。這件事不但對於一般人民幫助甚大，對於救濟當時的知識分子，尤有功蹟。（註113）

2. 潛邸舊侶對漢化的貢獻舉隅

元世祖忽必烈採行漢化完全是自動的，隨意選擇的。他是戰勝（征服）者，可以採行漢化，也可以不採行。可以與漢人合作，也可以不與漢人合作。但他終究走上合作的路子，這就不得不歸功於下列諸人的努力：

a. 董文用兄弟：

文用爲忽必烈掌管漢地文書，年幼即供職汗庭，通曉蒙古語文，並從許衡受學，通達經術與政事。曾奉命爲忽必烈徵召漢地遺老學者如竇默、姚樞、李俊民、李治、魏璠諸人。世祖即位（一二六〇）以後，出任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又薦王恽、胡祗遹、雷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徐琰、魏初等。這些人或爲忽必烈汗的顧問、侍從；或爲高級官吏，立功立言，影響甚大。（註 114）忽必烈對儒家不喜歡道學，對佛教不喜歡禪宗。「至元八年侍講學士單公履欲奏行科舉，知帝於釋氏重教而輕禪，乃言：『儒亦有之。科舉類教，道學類禪。』」意思是說，儒家道學一派，即類似釋家的禪學。忽必烈聽了很生氣，召姚樞、許衡與宰臣來，從事廷辯，董文忠適從外面來，忽必烈即說：「你終日讀四書，也是道學一流！」文忠是忽必烈藩邸舊人，熟悉蒙古語言，也曾從許衡們研究過儒家。「即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喜爲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讀書，從事實學。臣今所謂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最後又勸忽必烈不要輕信俗儒的挑撥，多疑多變，違犯教人修身治國的原意。忽必烈經過董文忠勸解，也就不問了。（註 115）蒿城董氏爲元初藩府舊臣中世家大族之一，他們對於忽必烈汗統治華北的成功，自是貢獻卓越，可以無疑。（註116）

b. 邢州邢臺派劉秉忠、張文謙等：

邢州在前清時代爲河北省的順德府，現在是刑臺縣，是早年忽必烈汗的分地。忽必烈汗依照蒙古習慣，選用分地俊才，供職王府，得劉秉忠、張文謙等。這些人又引用了劉肅、張耕、李簡等等，形成了所謂邢臺派，對當年忽必烈時代

所建立的中統至元（一二六〇～一二九四）之治，有很大的影響。《元史》（一五七）〈劉秉忠傳〉對於他的勳勞，有如下的稱道：「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以秉忠博學多材藝，偕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世祖大愛之，留潛邸備顧問。秉忠乘時上書言事，長數千百言；大要在討論如何治理漢地與如何採行漢法，恢復漢地的秩序。世祖深然之，既即位（一二六〇）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即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建元中統，立中書省，設宣撫司，建國號曰元。這些重大的設施與革新，「皆自秉忠發之」。當年忽必烈為便於統治兩個不同的地區，乃構想在草原與漢地之間，創建一個新都，以便兼統兩地。秉忠知其意，乃相地度勢，選於桓州東、灤水北。龍岡地區，建一新城。三年而畢，名曰開平。後城成，升為上都。地點即在今哈爾濱省的多倫多附近。後來忽必烈兼駐蹕大都，春夏巡幸上都，形成元代兩都並建的制度。這一設計，就是劉秉忠苦心孤詣助成的。（註 117）說到張文謙的功勳，更與「人為的力量」有關。他是邢州人。忽必烈汗欲在分地內選用當地俊才，秉忠薦舉了張文謙。應對稱旨，因任為王府的掌書記（即侍從秘書），日見信任。時漢地不治，邢州尤甚。「受封之初，民萬餘戶，後日削月減，纔五七百戶耳」。於是秉忠、文謙建議於忽必烈說：「今民生困弊，莫邢為甚。宜選妥人往治，責其成效，使四方取法，則天下均受賜矣」。於是選近侍蒙古人脫兀脫為之長，使漢人劉肅、張耕、李簡，協心為治。革去貪暴，流亡復歸，不期月戶增十倍。由是世祖心喜，益重儒術，任之以政。後日關中等地選任蒙古人為首長，漢人之賢者為佐理，使漢地秩序得以恢復，皆自張文謙發之。世祖即位，立中書省，任張文謙為左丞，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詔令一出，天下咸有太平之望。至元十三年（一二七七）遷御史中丞，十九年（一二八二）拜樞密副使，歲餘薨於位，年六十八。文謙生平以引薦人材為己任，時論亦以是多之，他對於這一點的貢獻也最大。（註118）

c. 京北賀氏家族：

忽必烈創建元朝的時候，中原有一批克難英雄，發揮智勇，說服了忽必烈，使他感覺蒙古習慣，不如中原文化。使他心悅誠服的在東亞建立了一個比美漢唐

的元朝。在這批克難英雄中，給忽必烈印象最深的，當推關中賀賁、賀仁傑父子。而賀賁六盤山的獻金，更是智勇兼備，令人欽敬。所以賀氏子孫，不但在元朝世爲上都留守，而且賀惟一更得到元順帝的賜姓，官至御史大夫，形成了漢人在蒙古朝罕有的際遇。（註119）賀賁六盤山獻金的壯舉，影響大極了。他不但獲得忽必烈的信任，形成蒙漢合作的事實，並且：(1) 由於賀賁的獻金，賀仁傑由此出入宮帳，學習蒙古語言，成了大汗的親信，「與董文忠居中事上，同心協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多所裨益。而仁傑言不外洩，帝尤深愛之」。大德九年（一三〇五）年七十二，請老，復以子勝繼任。勝亦習蒙古語，有時密奏，獨留勝許聽。子惟一仕至左丞相；(2) 賀賁又知道親近儒者，使仁傑、勝師事大儒許衡。諸儒欲有所建白，常常透過仁傑父子轉達大汗。由是蒙古大汗得知親近漢地儒者，漸漸習慣漢地文化。蒙古重部曲隨從關係，因此賀氏祖孫對蒙漢的溝通，盡了很大的責任；(3) 救了南宋末年苦守合州釣魚城的名將王立與數十萬忠義的軍民。（註120）又有人挑出《論語》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一點，認爲孔子曾有意誣蔑邊疆民族，向元世祖告密，以圖洩憤。忽必烈以此詰問賀勝，賀勝回答，孔夫子在兩千年前說出這句話，自然是有爲而發的，與現在無關，更不可誤解。且可汗承受天命，統有中國，更不應以古代小國之君自居。經此解說，元世祖釋懷，更加信用儒術。（註121）

d. 張德輝辨金非以儒而亡：

金亡以後，舊日金朝士大夫與北地漢人，合而爲一，勢力更爲強大。但因語言不通，朝廷又不重用漢人，乃倡出「金以儒亡」的口號，以誣蔑漢文化，同時並用以抵制漢人。一二四七年忽必烈在和林與張德輝懇談，提出質詢，可證這一問題已引起蒙古高階層統治者的注意。張德輝回答得很切實，他說金朝內外雜職，儒士僅占三十分之一，地位也不重要。金朝之存亡，自然另有原因，儒者沒有責任。這一段解惑的對話，不但可以正一時的視聽，也更堅定了忽必烈任用儒臣的信心。（註122）

e. 姚樞調和忽必烈與蒙哥汗間的衝突：

憲宗時代（一二五一～一二五九）蒙古統治者，如何治理聚居久處一地，人數眾多，當時稱為漢地（即長城以內各州縣）的漢人，自然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當時對於漢地的如何處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就大致說來，可分為兩大派。一派主張安撫合作，簡言之即採用漢法治理漢地，包括尊崇孔子在內。此派忽必烈領導之。一派主張與其他地區同樣看待，即不一定採用漢法，應用蒙古、西域、漢法混合處理，並不包括尊崇孔子在內。這一群人，大多數是蒙古貴族，自視甚高，偏重保守，輕視與漢人合作，也可以稱之為反忽必烈派，阿里不哥、阿藍答兒主之。蒙哥汗的意見，自然傾向後一派。這一派散居蒙古中央汗庭，人數眾多，久而久之，漸與駐節漠南的忽必烈等，形成對立。他們間，彼此觀點不同，衝突摩擦，勢所難免。（註 123）姚樞在忽必烈諸漢臣中，以持中退讓見稱。忽必烈與蒙哥汗因治理漢地的見解與看法不同，積有歧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蒙哥汗信之，即解除乃弟兵柄，派阿藍答兒等親來調查，事態極端嚴重。姚樞曾一度勸忽必烈辭謝全有漢地。至是又勸忽必烈「盡合邸妃，主先歸和林，為久居謀，疑將自釋」。這一行為，感動了蒙哥汗，遂得和解。（註124）

f. 許衡的時務五事：

許衡（一二〇九～一二八一）河南懷慶河內人。他的時務五事，等於諸葛亮的〈隆中對〉，或北宋王安石上給宋仁宗的萬言書，其要點：(1) 首先建議忽必烈要有「立國的規模」。「立國的規模」即是立國的大致方針，要以愛與公安定天下；(2) 指出北方草原民族兼有中原，必行漢法，方可長久，否則亂亡相繼，勢難立國；(3) 他認定只有實行兩元政治，方可彼此相安。兩元政治是蒙漢兩套並用的政治，不是各各的分治。例如在蒙古統治下的漢地，首長則以蒙古人或西域人領之，而輔佐則為漢人；(4) 並指出「為君難」以勗勉忽必烈努力實現「大有為天下」的理想。（註 125）又「衡每有奏對，或被召見，則上必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帝久欲開太學，八年（一二七一）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並親為擇蒙古及藩邸弟子（如安童、賀勝等）俾教之。衡喜曰『此吾事也，

國人子視聽專一，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選姚燧等十二人爲伴讀，待之如子弟，人人自得尊師之樂」。就這一例說，可知許衡也感覺到：培養翻譯人才與溝通兩種文化，須從教育入手的重要性。許衡能選用姚燧、呂端善等，擔任助教，爲蒙古子弟及可汗親信子弟的伴讀，這種教學方法，異常高明。（註126）總之，他對於元世祖的建立元朝，崇行孔學，出力最多，影響也最大。

g. 趙復的不言伐宋：

《元史》（一八九）〈儒學傳〉稱他爲江漢先生。乙未年（一二三五），蒙古南伐，復初被俘。楊惟中、姚樞奉詔令軍中求儒、道、釋、卜，因偕請至燕。設學教士，學子從者百餘人。時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復。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復不對。再問，因婉辭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心甚敬之。因不強之仕，且厚禮之。楊惟中、姚樞共議建太極書院，聚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元初北方知有程朱之學，實自復始。（註127）

h. 李治：

李治字敬齋，封龍山三老之一，是一位老誠謀國的學人，也是一位可敬的科學家兼經世家。自幼手不釋卷，聰慧絕倫。丁巳歲（一二五七），世祖居潛邸，遣親信董文用馳傳召見，懇談如何治理中國。李治在召見時，也詳述所見，贏得了忽必烈汗的歡心。他又輯錄召見時與皇帝問答的談話爲〈王庭問對〉一文。其重要內容：「王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欲難則難於登天，欲易則易如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按名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如反掌？無法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民，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至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賞罰也。法度隳，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爲幸矣。』」這一大段，完全是儒者

治天下的原則原理，對於元世祖也是易知易行的。（註 128）又曾合力勸說忽必烈擔任儒教的大宗師。這一舉動在當日對於中原人民影響之大，不言而喻。（註 129）

i. 王鶚、高鳴、李謙、李昶都是能言敢諫的文學侍從之臣，他們對恢復漢法，實行漢制，隨時進言，影響很大，貢獻更是多方面的（註130）

j. 商挺、徐世隆等是忽必烈的潛邸近臣，參與軍事要政。商挺曾勸忽必烈嚴立軍中符信，因以粉碎了阿里不哥圖謀自立的奸謀。徐世隆勸忽必烈建立太廟，制定朝儀，由是中原儒家的文治得以次第建立。這些不但是保全中原傳統的文化，簡直是努力推廣與提倡中原文化了。（註131）

3. 當時色目人蒙古人的助成漢化

忽必烈對於採行漢化態度的積極，除漢人方面竭力爭取蒙古可汗信任外，當時多數色目人與蒙古人的助成漢化，也是一個主要原因，茲舉三例，作為說明：

a. 廉希憲（一二三一～一二八〇）：

畏兀兒人布魯海牙之子。年十九得忽必烈於潛邸，容止議論，瞻視不凡，恩寵殊絕。篤好經史，手不釋卷。嘗與時儒許衡、姚樞輩談治道。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忽必烈問何書？對曰：「《孟子》」。又問其說謂何？希憲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使恩及四海……為對。忽必烈善其說，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元憲宗崩（一二五九），希憲勸忽必烈北歸即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興利除弊，典章文物，一遵儒教，當時翕然稱治。帝一日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為相，朕無此憂」。方士請煉大丹，敕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止之。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

曰：「然」。遂卻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世祖時代西域人而輔助姚樞諸人，贊助蒙古可汗推行漢化，實以希憲爲最著。（註132）

b. 高智耀：

河西人，西夏進士。西夏亡，隱居賀蘭山。憲宗即位（一二五一）智耀入見。因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亂。養成其材，將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憲宗）問：「儒家何如巫醫？」智耀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世祖在潛邸，已聞其賢。及即位召見，又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辯論，辭累千百。帝（忽必烈）異其言，鑄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戶皆從之給公文，爲佐驗。會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謂：「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故何如？」帝求報聘之使，以析其問。智耀入見，請行。帝問，所答劃一，敷對稱旨，即日遣就道（以上《元史》一二五〈本傳〉）。《元史》本傳所說。高智耀助成漢化的態度，比廉希憲更爲積極。（註133）

c. 丞相安童的傾心漢化：

安童蒙古貴族，成吉思汗功臣，四傑木華黎的四世孫。因世選習慣，至元二年（一二六五）爲中書右丞相。召大儒許衡至，令輔佐安童。至元四年（一二六七）春，安童即奏：內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忽必烈允之，由是諸儒（姚樞、商挺等）有建議決策之權。安童信任許衡、姚樞等，一時政令多從漢地舊制。西域計臣阿合馬、桑哥雖日事聚斂，而尚有所顧忌，安童主持之力居多。（註134）

4. 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後的安定南人問題

忽必烈禮用北方學人以安定了十三世紀的北中國（即是舊日的金朝），同樣也禮用了南中國的學人，又安定了一二七六年統一中國以後的江南。江南學者受到忽必烈特殊知遇的首推程鉅夫。（註 135）由於得君行道，屢言時政得失，極力爲南宋人爭取待遇，陳述疾苦，奏陳「吏治五事」（註 136），對安定南人，綏靖長江以南的南中國貢獻至大。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首陳興建國學，遣使江南搜訪人才，並請御史臺按察司均參用南人。忽必烈即命建國子監，命鉅夫以本官行御史臺事，命特齎漢字詔書，至江南訪求學人賢士。得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冲、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忽必烈皆用之，擢置臺憲，或任以文學之職。還朝拜集賢學士，仍還行臺。二十六年（一二八九），時桑哥專政，鉅夫上疏請罷之。桑哥請殺之，凡六奏皆不許。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又召鉅夫與胡祗遹、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商凝、陳儼、趙居信等赴闕賜對。三十年（一二九三）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興明文教，吏民畏愛之。這些都是程鉅夫在世祖平宋以後至晚年的重要活動。成宗以後，他的影響還在，但已無甚創見。（註137）

玖、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先生綜合他研究邊疆史的心得，又回過頭來看漢人歷史，指出中華民族的歷史，如大家所知道的，不但是時代悠久，沒有間斷；而且也是與時俱進，逐漸擴大。（註 138）「中國歷史所以悠久，沒有間斷的原因，我以之於應歸功於『中原儒教大同文化』的維繫」。（註 139）並說明之：

統觀我國歷史演變的段落，自秦漢到清末，可區分為兩大階段；而以大唐帝國瓦解的那一年（即西元九〇七年），作為劃分的界線。西元九〇七年以前經歷秦漢、隋唐，我們儼然有兩個羅馬帝國，可稱為兩個黃金時代；或儒教發揚光大時代。但自西元九〇七年大唐帝國瓦解以後，情形就不同了。中原漢族屢次遭受塞外的邊疆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滿州）的乘隙入侵；雜居混合，激動起若干新的變化。不過漢地住民的生活方式與基本文化，尚無改變。因為這些民族皆無例外的依次接受了中原儒教的文化，逐漸變成了廣義的中華民族。這些事實，自可證明中原儒教大同主義文化，具有世界性與客觀的價值；所以這一階段也可以稱之為儒教文化受考驗的時代。（註 140）

這一看法，就追究國史擴大與綿延的原因說，實已探驪得珠。簡單說，一部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儒家大同主義文化的發展史。自上古到戰國，是儒教大同主義的醞釀時期；秦與西漢的統一與強大的發展，是儒教大同主義文化的正式形成時期，也是奠定基礎時期。因此我們主張兩漢是我們第一個羅馬帝國。隋唐時是儒教大同主義文化第一次稱霸世界時期，因此也可以說是我們的第二個羅馬帝國。這兩個時期也都是儒教大同主義文化的黃金時代。但自九〇七以後，漢唐的威力，日趨銷沈；契丹、女真、蒙古相繼興起，並且入主中原，建國稱制。但是他們同時都自動的接受中原漢文化，變成儒教大同文化的繼承人。在這個大混合時期，北宋一百六十餘年是漢唐中原儒家文化的重獲休息時期。南宋一百五十餘年是漢唐儒教文化的江南開拓時期；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二百七十六年是漢唐儒教文化的二次休息時。清朝自一六四四到一八四二年，這一百九十餘年，是儒教大同文化第四次興盛時期。自九〇七年以後到一八四二年，主持的人物，大部份雖是歸化的邊疆民族，但東亞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政治制度的規模，經濟社會的組織，民間的日常生活，則仍是儒家文化。所以說，自遼初（九〇七）到清末葉（一八四二），是儒教大同文化的考驗時代。既然能擋得住時代的考驗，也就是儒教大同文化具有客觀、世界性的一個證明。（註141）

因此先生也贊成國史從殷商發祥，直到十九世紀的鴉片戰爭（一八四二），或二十世紀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曾經五大醞釀，四大混合的說法：

(一)有商、周、春秋、戰國的長期醞釀，而後有秦漢時代第一次的大混合。(二)有魏晉五胡十六國醞釀同化與南北朝的分途發展，而後有隋唐的第二次大混合。(三)有五代的醞釀與兩宋遼、金的分途發展，而後有大元帝國的第三次大混合。(四)有明朝與蒙古的對峙與休息，而後有大清帝國的第四次大混合。現在另是一個新的時代了。這一新時代，應從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算起，直到目下反共抗俄時期，猶未過去。我們認為這一百年的長期苦難，當是另一新的醞釀時期；醞釀著另一個偉大時代的出現。這個大時代，應當是從我們反攻大陸成功時期開始，漸漸轉變到以中國為主，另成一二十世紀下半期的，自由世界中富強康樂的中華民國為止。(註142)

亦即，中國文化是多元的，以漢唐儒家文化為主流，而以黑水白山半農半獵的文化為第一支流，以草原遊牧社會文化為第二支流，以西南夷文化為第三支流。就歷史的形成說，東北區域尤為重要，就演進的大勢說，漢唐中原農業文化是主體，第一、二、三支流文化是輔佐。

中國文化與民族發展次第，是自北而南的。邊疆民族的入侵，也以北方與東北方的南下為主潮，甚至說我國的歷史，是由北方，東北方民族與中原文化交織而成，亦無不可。因此「長城」、「黃河」與「長江」，也確實形成了國史上的三道防禦線，我們稱之為儒教大同文化的三大保障。長城，奠基於秦代，顯耀於兩漢，形成隋唐以後中原文化對東北與北方邊疆民族勢力消長的關鍵。牠可以說是中原漢民族的前進基地，也可以說是中原民族與儒教文化的門戶。自東漢以後，北方與東北邊疆民族，欲問鼎中原者，必先佔領長城。佔領了長城，才能有權力過問中原黃河流域的政治；才能對中原政治有發言權；纔有用武力干涉的機會。契丹是如此，女真是如此，蒙古更是如此。黃河，就大勢說，居中國之中，為歷史上之心臟地帶。西元九四七年，契丹太宗耶律德光佔領了黃河，即一變從前番不治漢的態度，正式宣布建立遼朝，改元大同。倘非歸途得病而死，則以開封為中心的中原黃河流域，第十世紀怕已歸屬契丹了。至於長江對於南宋的保障，更是瞭如指掌。當一一二七年以後，一一四一年宋金劃淮議以前，這一階段，女真鐵騎的被阻止，南宋人猶能在杭州初而苟安圖存，進而開發閩、桂、湘、黔，可以說全是受了地勢的限制。也可以說是長江在第十二世紀上半期拯救了南宋。(註143)

這些對國史發展的深遠看法和精闢分析，都是前賢所未曾闡發的。這層看法，曾先在他撰寫的紀念北大老同事盧逮真的文章中述及，刊出後又手書一段增補的文字，記云：

中國在歷史發展中能形成一個龐大的中華民族，推究其原因當歸功於中原漢人既有智慧，又有群力，所以漢唐盛時建立大國，創造持久的文化。但現在情形有點不同了，我們的文化沒有進步，而外國如英、美、德、日等則文化發達，超越吾人，若不努力直追，恐即有覆滅衰退的危險。日本人統治台灣五十年，台灣人中即有一部分擁護日本忘棄祖國，這一點很可以使我們警惕，使我們明瞭當前局勢的危險，知道了努力的方向。猶太人命運呢？日本人的中興呢？這也得我們好好想一想。（註144）

這段文字發人深省。

拾、結論

爲避免遺珠之憾，再贅補本文前面章節所未包含者，如下：

(1)突厥對唐朝的態度：

- a.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秋，突厥頡利可汗大舉入寇。高祖遣鄭元璁往見頡利，責以負約。雙方談話的要點，可以看出番漢文化的各異，與突厥人對於漢化的態度。「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收金幣之利。熟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璁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以上《舊唐書》《新唐書》〈鄭元璁傳〉，《通鑑》卷一九〇略同）。然終能說服頡利可汗，就是他明白夷夏利弊的緣故。（註145）
- b.突厥不願接受漢化：突厥毗伽可汗時代（七一六～七三一），常計畫建築城池，創立寺觀，接受中原文化。賴富有智略的老臣噶欲谷力爲勸解，沒有實行。《唐書》（列傳卷一一四上）〈突厥傳〉記載此事甚詳。（註146）

(2)明清時代的長城：

- a. 明朝重建長城，縮小範圍，改爲邊牆，用以防制蒙、滿兩族的入侵，同時也用以保障中國（中原）（註 147）
- b. 清朝。入關後才能建大清帝國，統一中國與邊疆各地。「入關」就是進入長城，這一步驟是清朝發達成爲大帝國的一個重要關鍵。（註 148）

(3)遼金元以後的黃河：

- a. 石晉時代，契丹入汴，黃河絲毫沒有引起防阻的作用。（註 149）
- b. 宋金時代，黃河（黎陽渡）守兵，不戰而潰。清湯運泰《金源記事詩》有〈渡河笑〉一詞，描寫甚具匠心：「河南渡，眾兵笑。江山如此棄不守，函谷何用戍卒叫！」但女真人則能利用黃河天險，防阻蒙古的騎兵。所謂「金國所恃，潼關、黃河與哈達而已」。即可證明女真人的獨能利用黃河。（註150）

(4)女真人、契丹人、蒙古人對於接受中原漢化態度的比較：

大唐帝國瓦解以後入主中原的東北民族，首爲契丹人，次爲女真人，再次爲北方的蒙古人，最後又是東北的滿州人。大體上說，契丹人統治中原的態度是放任的。目的在享樂與羈縻，對於漢人只有消極的剝削，而沒有積極的管治。這自然也是合理的。契丹與燕雲十六州歸他們統治以後，曾實行一種兩元政治；就是以契丹舊俗治契丹，以漢人成法治漢地。番漢之間只求苟安無事，並沒有一種互利進步長期合作計畫。蒙古人初入中原，大體上仍是以掠奪爲原則；利用與剝削以外，對中原漢人的生死榮枯不關心；雖間有一時的撫慰，（如太祖太宗的信任耶律楚材、邱處機等）實無久安的遠圖，元世祖忽必烈算是最關心漢地治安的了。但他推行的政策，以蒙古人管軍，以西域人理財，以佛教爲國教，以漢法治漢地。當時的漢儒、漢人，祇是政治上一小部分的助手，仍未能超出利用與剝削的大原則；因此軍事停止，統治權也就跟著瓦解。比較上番漢合作最親切，最現實，文化與武功也能比較配合的，要算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與清朝了。在這兩個朝代，就番漢兩大種族長期合作後混合的結果與經過說；有利用也有互助，有衝突

也有了解；文治武功，相得益彰；可與漢唐並駕齊驅，而視宋明遼三朝爲優勝。金朝的疆域，廣大雖不及蒙古人，而文化的成就則遠非蒙古朝可比。我們承認東亞中華文化的第二主流是女真人，理由即在於此。清朝就以往的歷史說，是次於漢朝唐朝的繁榮時代；金朝是清朝的前驅；這種好的開端可以說是從金朝開始。

（註151）

陶希聖先生曾追憶：

從吾每與我談論，常以爲兩漢大一統四百年之後，中國政治的局面與文化的影響迭有開展。在唐代擴至中亞細亞，在元代遠達歐洲地中海濱。至今亞洲諸民族各自溯其遠源，皆須求之於中國史。但中國史學卻未能盡力尋繹亞洲各地區諸民族在中國政治的局面與文化的影響之下，互相衝激或互相融和的軌跡與果實。（註152）

宋晞先生進一步說明：

誠如陶希聖先生說的，他（姚從先生）確是努力於尋求亞洲各地區諸民族在中國政治的局面與文化的影響之下，互相衝激或互相融和的軌跡與果實。他的治史收穫是豐碩的，他的識見影響是深遠的。（註153）

吳相湘先生則指出：

至於自蒙古、女真、契丹人的漢化以說明中華儒家文化的偉大淵博，更是以身作則：中國歷史的研究不僅是繁瑣考據，更注重義理的闡釋，但這種闡釋是必需根據史料而不是遊談無根。（註154）

檢視本文所述先生對於中國史上漢化問題研究之成果，陶、宋、吳三位先生所言，絕非溢美。因此，張其昀先生盛讚：「中國學者研究中亞史地，特重塞外牧族華化過程，旨在洞明歷史真相，駁斥外人謬論。從吾於此道研幾之功獨深，其成就亦最大」。

先生治史，態度嚴謹，始終服膺十九世紀以來德國史學以科學治史的方法：注重原手史料，實事求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並對於國內外學術界的動態和研究現況，非常注意，時時提醒我們留意學術界的「行情」，以免落在人家後面，或作了人家已經做過的工作。此除深表敬佩外，直欲急起效法。

先生一生經歷內憂外患，爲學獨具先憂後樂、悲天憫人的胸懷，其於洞察國史擴大綿延之際，曾深深致意：

中國近百年來戰亂頻仍，一切落後，所處國際地位，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是異常艱苦的。擺在我們面前的，確實是數千年來空前未有的大變局。所遭遇的對手，也確實是數千年來空前未有的文明大國，與空前兇狠的狂妄強敵。我們當前努力的方向與任務，已不能再用「夷狄進於中國者，則中國之」的舊方式。相反的，而是如何聯結自由世界，戰勝強敵，光復大陸。對自由世界，是如何見賢思齊與擇善而從，期與世界先進各國共存共榮，而不致遭受排斥與淘汰。（註156）

至論其影響，則在於先生引領孫同勛（拓跋魏）、陶晉生（女真）、王民信（西夏、蒙古）、蕭啓慶（蒙古）、札奇斯欽（蒙古）、管東貴（滿洲）、陳捷先（滿洲）諸賢達，擴大中國史上漢化問題之研究。而此正如張寶樹先生所言：

從吾先生是治蒙古、遼金歷史專家，這在歷史學方面，可說是冷門課程，其實這是他獨具慧眼，國家之強，在講求國防，而國防之強，則須堅固邊疆。鼓勵青年往邊疆，須先誘導青年研讀邊疆歷史，青年對於邊疆歷史有了興趣和研究，自然志願到邊疆去開拓事業。以一個中原人士而專治艱澀的邊疆史學，這是先生的高瞻遠矚，亦非一般人所能及的。（註157）

註釋

註1 有關姚從吾先生之生平傳記，請參閱下列諸大作（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王德毅：〈姚從吾〉（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名人傳》，第二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頁一九〇～二〇〇。吳相湘：〈姚從吾譯註蒙古秘史〉（《民國百人傳》，第一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元月十五日），頁二四三～二四九。姚從吾先生治喪委員會編印：《姚從吾先生哀思錄》（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張儺生：〈姚從吾先生傳略〉（國史館編印：《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五輯，台北，國史館，中華民國八十年二月），頁一七〇～一七四。陶晉生：〈追憶姚從吾先生〉（《歷史月刊》，第十一期，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頁一一～一五。《姚從吾先生行述》（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五）。〈姚從吾先生行述（一八九四～一九七〇）〉（大陸雜誌社：《中國近代學人象傳初輯》，台北，大陸雜誌社，中華民國六十年九月初版），頁一一二。〈姚從吾（1894～1970）〉（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一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年九月三十一日再版），頁一一六～一一七。

註2 陶晉生，前揭文，頁一五。

註3 王德毅，前揭文，頁一九四。

註4 札奇斯欽：〈追憶吾師姚從吾〉（《姚從吾先生哀思錄》），頁七一。

註5 陶晉生，前引文，頁一三。

註6 陶晉生：〈後記〉（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遼金元史講義——甲·遼朝史》，台北，正中書局，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四月），頁三三八。

註7 全上。

註8 詳見本文「玖、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註9 〈契丹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遼金元史論文（上）》，台北，正中書局，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頁三五～三六。

註10 全註4。

註11 〈遼金元時代的長城〉（《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三。

註12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姚從吾：《東北史論叢》上冊，台北，正中書局，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九月），頁五。

註13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七。

註14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〇～一一。

註15 陶晉生：〈後記〉（《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頁三三九。

註16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姚從吾：《東北史論叢》下冊，台北，正中書局，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九月），頁四〇〇～四〇一。

註17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二一。

註18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二～三。

註19 王民信：〈編後記〉（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遼金元史論文（下）》，台北，正中書局，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四月），頁四九〇。

註20 王民信：〈編後記〉（《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頁四八三。

註21 費海璣：〈追思姚從吾先生〉（《姚從吾先生哀思錄》），頁一一八。

註22 陳捷先：〈哭從吾師〉（《姚從吾先生哀思錄》），頁一〇七。

註23 〈近代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三一。

註24 〈匈奴與西漢爭奪東亞霸權的檢討〉（《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二八。

- 註25 〈匈奴與西漢爭奪東亞霸權的檢討〉（《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二九。
- 註26 〈匈奴與西漢爭奪東亞霸權的檢討〉（《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三九。
- 註27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八。
- 註28 全上。
- 註29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九。
- 註30 全上。
- 註31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一。
- 註32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二。
- 註33 全上。
- 註34 〈近代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三五、七〇、七四。
- 註35 〈契丹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三八。
- 註36 以下相關敘述，請詳參：〈契丹漢化的分析〉、〈契丹人的「捺鉢生活」與若干特殊習俗〉（又名〈說契丹的捺鉢文化〉）、〈遼朝契丹族的捺鉢文化與軍事組織世選習慣，兩元政治及遊牧社會中的禮俗生活〉、〈契丹漢化〉、《姚從吾先生全集（二）》。
- 註37 〈契丹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四七～四八。
- 註38 〈遼金元時代的長城〉（《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二。
- 註39 〈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九三。
- 註40 《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頁五。
- 註41 《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頁六。
- 註42 〈契丹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五〇～五一；又《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頁九。
- 註43 全上。
- 註44 〈契丹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五〇～五一；又《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頁九～一〇。
- 註45 詳閱〈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又〈契丹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五一；又《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頁一〇～一一。
- 註46 《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頁六～七。
- 註47 詳閱〈阿保機與後唐使臣姚坤會見談話集錄〉；又〈遼金元時期通事考〉（《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一五～一六，《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頁一六。

註48 全上。

註49 《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頁一八～一九。

註50 〈契丹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五三～五八；又《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頁五五～一四八；又〈遼朝契丹族的捺鉢文化與軍事組織世選習慣，兩元政治及遊牧社會中的禮俗生活〉、〈契丹漢化〉。

註51 詳閱〈從宋人所記燕雲十六州淪入契丹後的實況看遼宋關係〉，又《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頁三〇～三三；又〈契丹漢化〉。

註52 全上。

註53 全註51。

註54 〈契丹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五七～五八；又〈契丹漢化〉。

註55 詳閱〈說遼朝契丹人的世選制度〉；又〈契丹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五八～六二；又〈契丹漢化〉。

註56 詳閱〈契丹君位繼承問題的分析〉；又〈契丹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六二～六三；又〈契丹漢化〉。

註57 〈契丹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五二；又《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頁二二一～二二八。

註58 詳閱〈遼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詞冤獄的文化的分析〉；又《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頁二七四～二九六。

註59 遼五京：1.上京臨潢；2.中京大定、興中；3.東京遼陽；4.南京析津；5.西京大同。（〈遼金元疆域沿革與地理因素對當時政治文化的關係〉，《東北史論叢》下冊，頁八〇～八一。）

註60 〈契丹漢化〉（方豪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二冊《歷史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年十二月），頁八六。

註61 王民信：〈絲路上消失的古國〉（《歷史月刊》第八十期，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一日），頁三三～三四。

註62 《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頁二三三。

註63 全上。

註64 〈富弼〉（《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一五八；又《姚從吾先生全集（二）》，頁二三三。

註65 全註62。

註66 〈女真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一六四。

註67 〈金朝上京時期的女真文化與遷燕後的轉變〉，（《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一～四七；又〈遼金元疆域沿革與地理因素對當時政治文化的關係〉，（《東北史論叢》下冊），頁八五～九一；又〈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一四四～一五四；又〈女真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一六五～一七八；又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姚從吾先生全集（三）——遼金元史講義——乙·金朝史》（台北，正中書局，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頁九七～一一八。

註68 〈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一五二；又〈女真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一七七～一七八；又《姚從吾先生全集（三）》，頁一〇一～一〇六。

註69 〈女真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一九五～一九六；又〈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一六五～一六六。

註70 〈女真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一六六。

註71 〈女真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一八六。

註72 〈女真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一九四；又〈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一六一～一六二。

註73 《金史》（卷十四）〈兵志〉說：「其部長曰孛董，行兵則稱猛安或謀克，從其（眾）多寡以為號。猛安者，千夫長也，謀克者，百夫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曰阿里喜。部卒之數，初無定制。」這與元初成吉思汗時代的「千戶制度」也極相似。即是以千戶或百戶為軍隊組成的單位。人多的稱為猛安，是一個大一級的單位。少一點的稱為謀克，是一個次一級的單位。人數自然也不限定一千人或一百人。《金史》又說：「太祖即位之二年，始命以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一猛安」。那末猛安有三千戶略當於近代團營制的一個混成團或一旅了。又說：「諸部來降者，率用猛安、謀克之名，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這是猛安謀克制度的逐漸擴大。又說：「及來流，鴨水，鐵驪，繁古之民皆附，東京（遼陽高永昌）既平，山西繼定；內收遼漢之降卒，外籍部族之健士，嘗用遼人訛里野（等）以北部人百三十戶為一謀克；漢人王六兒（等）以諸州漢人六十五戶為一謀克，王伯龍及高從祐等並領所部為一猛安。」由這一段可證在編制上遼人漢人的猛安謀克，遠較女真各部為小。「皇統五年（一一四五）罷遼東、渤海、漢人猛安謀克承襲之制，浸移兵柄於其國人。乃分猛安、謀克為上中下三等。宗室為上，餘次之。」這是金初上京時代女真人兵制的概況。（〈金朝上京時期的女真文化與遷燕後的轉變〉，《東北史論叢》下冊，頁四〇～四一；又〈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一五二～一五三；又《姚從吾先生全集（三）》，頁一〇八～一一〇。）

註74 〈女真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一七九～一八二；又〈女真建國與漢化〉（方豪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二冊《歷史學》），頁五八。

- 註75 〈遼金元時代的長城〉（《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五。
- 註76 〈遼金元疆域沿革與地理因素對當時政治文化的關係〉（《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一一二～一一三；又〈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二〇～二一。
- 註77 〈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一一八。
- 註78 〈女真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一八六～一九三；又詳閱〈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及《姚從吾先生全集（三）》（第七講，所謂金世宗的「小堯舜時代」），頁一五五～二〇一。
- 註79 〈金朝上京時期的女真文化與遷燕後的轉變〉（《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四、五八～六四。
- 註80 詳閱〈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東北史論叢》下冊）；又〈元邱處機年譜〉（《東北史論叢》下冊）；又〈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與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遼金元史論文（中）》，台北，正中書局，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四月）；又〈金元全真教〉。
- 註81 王履常：〈「從吾所好」「死而後已」——追念姚從吾老師〉（《姚從吾先生哀思錄》），頁六一。
- 註82 札奇斯欽，前引文，頁七一。
- 註83 王民信：〈編後記〉（《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頁四九一。
- 註84 〈遼金元時代的長城〉（《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九。
- 註85 〈遼金元時期通事考〉（《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二四～三二。
- 註86 此處轉引自〈成吉思汗的智囊團〉（《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二〇五。
- 註87 〈成吉思汗的智囊團〉（《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二〇六～二〇七；又〈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七七；又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姚從吾先生全集（四）——遼金元史講義——丙·元朝史》（台北，正中書局，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九月），頁八二。
- 註88 詳閱〈元邱處機年譜〉；又〈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一八四；又〈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與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三～六；又《姚從吾先生全集（四）》，頁八六～八七。
- 註89 《西遊記》。分上下兩卷及附錄；包括全部有關長春西行的重要公文。自棲霞到撒馬爾干，赴行宮初謁成吉思汗止為上卷，再回撒馬爾干至東歸及死為下卷。此書名為李志常作，實為邱處機與諸大弟子合著之旅行傳道報告。就中收有長春西遊全部詩詞、談話及

與諸大弟子和人的交際情形。李志常西遊時，中途留阿不罕山的棲霞觀，並未親到撒馬爾干與雪山。他祇不過是此書的總編輯。（〈元邱處機年譜〉，《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二七四）。

註90 〈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一八七。

註91 〈元邱處機年譜〉（《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二一七。

註92 〈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與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八。

註93 〈耶律楚材與元太宗〉（方豪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二冊《歷史學》），頁八六～八七。

註94 〈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二四八～二四九。

註95 〈元好問癸巳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一六一～一六二；又〈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二二三～二二四。

註96 〈元好問癸巳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一六六。

註97 〈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二三四～二四三；又〈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九〇～三九二；又〈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〇六～四〇七；又〈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二二～四二三。

註98 〈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二四五～二四八。

註99 詳閱〈金元之際孔元措與「衍聖公職位」在蒙古新朝的繼續〉；又〈元好問癸巳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一七三～一七四。

註100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七六～三七七。

註101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二七～四二八；又〈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七八。

註102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二八；又〈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四二八～四二九。

註103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八二。

註104 全上。

註105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九七。

註106 全上。

註107 全註105。

註108 〈遼金元時期通事考〉（《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二九～三〇；又〈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〇五～四〇六；又〈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三〇。

註109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三一；又〈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九〇～三九一；又〈元好問癸巳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一八三～一八四；又〈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二三四～二四三；又〈元初封龍山三老之一李治與關於他的若干問題〉（《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頁九〇。

註110 詳閱〈忽必烈汗與蒙哥汗治理漢地的歧見〉；又〈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三三～四三四；又〈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八六～三八七。

註111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三四～四三五；又〈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〇七～四〇八。

註112 〈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一一～四一三；又〈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九八～三九九。

註113 〈元邱處機年譜〉（《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二六八～二六九。

註114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八三～三八四；又〈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問題〉（《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頁一八～一九；又〈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問題〉（《文史哲學報》，第十七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印行，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六月），頁三四。

註115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三五；又〈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〇八。

註116 〈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問題〉（前引），頁三四；又〈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問題〉（《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頁一四～一七。

- 註117 〈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問題〉（前引），頁三五四～三五五；又〈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問題〉（《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頁一九～二〇；又〈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八四。
- 註118 〈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問題〉（前引），頁三五五；又〈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問題〉（《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頁二〇；又〈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八四～三八五。
- 註119 〈六盤山賀貢獻金〉（《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頁一三三。
- 註120 〈六盤山賀貢獻金〉（《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頁一三四～一三五；又〈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問題〉（前引），頁三五五～三五六；又〈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問題〉（《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頁二〇～二一；又〈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八五。
- 註121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三四～四三五；又〈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〇七～四〇八。
- 註122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三一～四三二。
- 註123 〈忽必烈汗與蒙哥汗治理漢地的歧見〉（《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三八一。
- 註124 全註110。
- 註125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二五～四二六；又〈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八九。
- 註126 全註108。
- 註127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八八。
- 註128 〈元初封龍山三老之一李治與關於他的若干問題〉；又〈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二四～四二五；又〈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四〇四～四〇五；又〈元好問癸巳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一八五。
- 註129 〈元好問癸巳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一七一；〈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二三三。
- 註130 全上。

- 註131 〈元好問癸巳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一七二；〈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姚從吾先生全集（六）》），頁二三二。
- 註132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九二～三九三。
- 註133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九三。
- 註134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九三～三九四。
- 註135 程鉅夫受到忽必烈汗的特別知遇，其因有二：1.由於相貌出眾，以引起必烈可汗的注意；2.由於評論賈似道立言公正更增加忽必烈汗對他的尊重。（〈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問題〉，前引，頁三五八～三六四）；又〈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問題〉（《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頁二二～三〇。
- 註136 吏治五事：1.取會江南仕籍；2.通南北之選；3.立考功曆；4.置貪贓籍；5.給江南官吏俸錢。（〈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問題〉，前引，頁三六七～三七〇；又〈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問題〉《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頁三一～三四）。
- 註137 〈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問題〉（前引），頁三六五；又〈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問題〉（《姚從吾先生全集（七）》），頁二九～三〇。
- 註138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
- 註139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四。
- 註140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六～七。
- 註141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九～一〇。
- 註142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二～一三。
- 註143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七。
- 註144 王德毅，前引文，頁一九六。
- 註145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二二。
- 註146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二二～二三。
- 註147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九。
- 註148 全上。
- 註149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二〇。
- 註150 全上。

註151 〈女真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頁一九七～一九八；又〈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一六八。

註152 陶希聖：〈姚從吾先生誄〉（《姚從吾先生哀思錄》），頁九九。

註153 宋晞：〈悼念姚從吾先生〉（《姚從吾先生哀思錄》），頁八〇。

註154 吳相湘：〈姚從吾師盡瘁史學〉（《姚從吾先生哀思錄》），頁九〇。

註155 張其昀：〈今之良史——永憶姚從吾先生〉（《姚從吾先生哀思錄》），頁一一〇。

註156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三。

註157 張寶樹：〈紀念從吾先生〉（《姚從吾先生哀思錄》），頁一一五。